

我的高耀洁妈妈

依娃 著



天宇中，一颗永远闪耀的明星

我的高耀洁妈妈

依 娃 著



一颗永远闪亮的星

——读依娃《我的高耀洁妈妈》

谭松



高耀洁医生和38980高耀洁行星证书

两年半前，2018年9月，依娃告诉我，高妈妈前不久住院抢救，大病初愈，希望我能去看看她。

早在国内时，就了解了高耀洁医生的感人事迹，在这个犬儒弥漫、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的时代里，高耀洁医生真是如一颗孤独的明星，闪耀在黑沉沉的天庭。

能去看望这位伟大的女性，是我的渴望，也是我的荣幸。我于是从洛杉矶出发，赶赴纽约。

10月16日，依娃带领我和小丁来到了高妈妈的小屋。高妈妈躺在床上，吸着氧。我望着床上虚弱无力的老人，突然有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眼前这个虚弱苍老的身躯里，蕴含着一种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她迈着她那双曾经裹过的小脚，在古稀之年奔走在那片苦难的、沾满了血污的大地上。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行程：一路上，苦难加苦难、泪水加泪水。那个抱着上吊妈妈的脚，一声声叫着“下来”、“下来”的男童悲啼，成为她心中永恒的悲与痛。十多年里，她负重独行，心灵，承受着一个又一个悲剧的折磨；精神，受到一次又一次当局的打压……

依娃在《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一文中写道：“年轻时候的她，听说一位产妇难产面临危险，她连夜骑上毛驴到农村抢救下了这位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如今已经不能走路的她要以老病之身乘车去看望患病的老朋友。‘我是医生，一看到病人，我的腿就迈不开了，就想治好他。’”

这段话我读了好几遍，心中的情感仿佛已经不是“感动”一词能够描述。眼前这个虚弱身躯里为什么储藏着那么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原因是：她心中充盈着巨大的爱和对人类苦难的无限悲悯！

高妈妈看到依娃，非常高兴，白发微颤，慈祥满面，那神情像是母亲见到久别归来的爱女。依娃俯下身，握住高妈妈的手，脸贴近她的头，双目含笑，满面幸福。这一对不是母女，胜似母女的相逢情景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依娃在本书中有很多关于她与高妈妈的情感描写，比如她在《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一文中写道：“我上前拥抱住我的高妈妈，她也抱住我。人们常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我和高妈妈不是娘俩，感情比娘俩还要好。”“感谢上帝的美意！让我和高耀洁妈妈这位年纪相差将四十岁的人相识交往……她高尚的人格、坚毅的精神、渊博的学识、待人的真诚和宽厚更是成为了我今生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楷模。我对这位老人已经有了深深的爱和感情，她已经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每次离开高耀洁妈妈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在屋里拥抱过她，出了门再拥抱……原来世界上并非只有男女之间的爱情能

让人品尝甜蜜和美好。”（《我的高耀洁妈妈》）

我站在高妈妈的卧床前，望着这一对幸福的“母女”，不禁想到：高妈妈是不幸的，在耄耋之年孤身流亡异域他乡；高妈妈又是幸运的，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一个理解她、尊敬她、照顾她、待她如亲母的爱女——依娃女士。

说到高耀洁医生在82岁高龄被迫流亡，心中又涌起另一种强烈的情感——悲愤！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当局可以肆意制造种种灾难，却不准任何人去揭露灾难；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当局可以肆意编造弥天谎言，却不准任何人去调查真相！依娃在文中写道：“她对我说：‘是我无意中遇到那个艾滋病人，才知道灾难那么大，我是被逼的。’一路走来，同行人的被开除工职，有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泄露国家机密’被关监狱。高妈妈说：‘如果不是有些名望，早进监狱了。’”

朱学勤先生说：“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

在站在高妈妈床前之前的大半年，我也流亡到美国，当时，居住的陋室没有网络，我便天天到一个公共图书馆上网阅读。一天，突然读到一篇关于高耀洁医生流亡美国后的文章，文章说，高医生不得不在82岁高龄时孤身流亡海外。离开故土后，她说：“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永远记得，这句话让我浑身一震，一股压抑的悲情排山倒海涌上心头，刹那间，双眼泪水迷蒙——这是我到美国后短短十余天的第二次泪水。（第一次，是为送别我的母亲，她与高妈妈同年。）

同高耀洁医生一样，我也是被迫流亡异国他乡。高医生是因为揭露血浆经济的黑幕，受到当局的打压；我是因为调查中共土改运动的真相，受到中共的迫害。

正因为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出走，因此，对那生活了数十年的故土，我们有一种更深沉、更厚重的情感；正因为曾多年在那片土地上奔走采访，因此，对那故土上的苦难和遭受不幸的同胞，我们更有一种刻骨铭心和魂牵梦萦的感怀；正因为对那片生养了我们的故土有无限的爱，因此热切渴望为她付出我们有限的生命时光。

依娃在《我的高耀洁妈妈》一文中写道：“‘我想回郑州！’郑州是高耀洁妈妈的家，是她生活工作过五、六十年的地方。孤独的时候，忧伤的时候，她会突然这么说。”

相同的遭遇和相同的经历，使我对“我想回郑州！”感受极其深沉。高耀

洁医生是一个怀揣着大爱的斗士，也是一个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英雄。2015年，她得知，四川凉山因艾滋病死亡，天天埋人，根本没有人去管。当时她已经88岁，她说：“我现在身体不行，如果身体行，我就去四川凉山了。如果在十年前，我就去了，我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读到这一段时，在感佩之余，也突然觉得她给我日渐衰老的身躯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生命活力和一种提升我心灵的精神感召。

“我想回郑州！”绝不仅仅是对那片生养了她的土地的乡愁。

可是，注视着卧床不起的老人，我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梦了。（令人惊赞的是，高妈妈后来又站立起来，又在电脑前写下大量的文字！）

故土难归，有家难回，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悲伤。但是，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高妈妈已经在她有限的生命里，给那黑沉沉的世界留下了一束永不熄灭的光——那是在这个沉沦的时代里，昭示着精气神的民族之光；那是在这个扭曲的社会里，展示出真善美的人性之光。

抬起头，向那浩渺的苍穹望去，那儿，闪耀着一颗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她说：“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依娃说：“她的爱就像天上那颗38980高耀洁行星，不停地闪亮着，永远挂在天空。”

2020年10月11日

于拉斯维加斯

自序：一点心意

依娃



小行星38980以高耀潔來命名



高妈妈送的花种地下了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去纽约看望高耀洁老妈妈了。我真的很想念她老人家，可谓牵肠挂肚。

正常情况下，我会三个月左右去一次，带点新鲜蔬菜，在她所住居的大楼对面超市里买两只小鸡，几盒鸡蛋带给她。小住两天，和她说话，看书稿，一起吃饭。早晚她做吸氧的时候，我就到附近的河边公园转一转，看看公园里的树木花草，看看河边的风景。时间差不多了，就赶紧回去，不想让高妈妈着急。

本来，我是打算今年三月去纽约看望她的，但是那时，中国的病毒已经以山火之势跨洋蔓延传播，“熊熊燃烧”起来。纽约每天都有上万人感染，数百人死亡。令人痛心的是警察、医护、地铁工人这些公共服务人员感染死亡人数巨大。这让我非常担心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一座大楼上的高耀洁妈妈，一方面她年纪大，有这样那样的病，抵抗力差。另外一个方面，她有三个轮流值班的看护，她们需要搭乘地铁或者汽车来上班，接触陌生人比较多，是一个危险的来源。特别是居住在华盛顿地区的著名作家余梨华女士因为看护感染而受传染，最后不幸离世的消息，让我更加担心高妈妈的处境。我在心里一直默默祈祷：“高妈妈，一定多多保重，我们要挺过去，我还要去看望你。”

我也多次叮嘱和我比较熟悉的看护小熊多注意，她说要上班也没有办法，只有戴口罩，戴手套防范。她照顾高妈妈多年，令人比较放心。

去不了纽约，就经常给高妈妈写信，表达我的想念，解除她的寂寞。我一而在再而三的告诉她：“谢绝来客，不要让任何人来看望你，不要接触任何人。”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是传染源，是“嫌疑犯”，特别是重灾区纽约。我知道，老人喜欢有客人来，喜欢和人说话。可是这个时候，“与世隔绝”是自我保护的唯一办法。

我给高妈妈的信总是零零碎碎，说我家门口发现一个鸟巢了，里面有五个蛋了，母鸟开始孵蛋了，小鸟出来了。高妈妈也经常回信询问鸟的新情况，并告诉我鸟的一些知识，说她小时候养过鸟。高妈妈去年给我的喜拉莉女士所赠送的花，春天我给它换了大些的盆子，不想它长势凶猛，到秋天已经很大个头了。左思右想，终于决定把它种在花园里。我很舍不得，因为如果有一天搬家搬不走花。但是这种花需要扎根土地需要雨露浇灌才能蓬勃生长，我将种花的情况“汇报”给高妈妈，她叮嘱我剪下几枝扦插，下次来纽约带给她……，我家中院子里

的各种花卉盛开的时候，我都拍了照片给她寄去，让她看看。最近枫叶红了，赶紧拍了几张寄去。不知道，看护还推她下楼看看不？出入大楼又是否安全？我知道，这一年，因为疫情，她的儿女都不能够来纽约看望她陪伴她。就是多少年每个月来看望她的黎安友教授也不能够来吧？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孤孤单单的，唯一能够解闷的就是电脑。

令人惊讶的是，前两个月高妈妈寄来几篇稿子，是她以前看病的一些特殊病例记录。我看了赶紧回信说：“如果你身体允许，就多写点，写多少算多少，够十来万字了，我们就能够出版一本书。”我这样“煽风点火”，因为我知道写作对高妈妈身体好，让她精神上有所寄托，不那么寂寞，也会总操心写作的事情。另外我说：“你的这些工作经验非常重要，让人们看看，中国有这样的医生，一心为病人，救病人的命。不像现在的医生，不见钱不动弹，见钱眼开。病人上了手术台，手术做到一半，让病人加钱。这哪里是医生，简直就是白衣魔鬼！”

唉！其实我也很悲哀，高妈妈的书写出来了，出版了，也运不回国内。艾滋病她呼吁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又给了个什么说法？他们忙着一带一路，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忙着全国奔向小康。这个为人类健康事业最出一个医生应尽责任的高耀洁老妈妈，无可奈何地在异国他乡煎熬地度着多病孤独的晚年。那么多高官贵人来纽约国事访问，没有见那一位来看望她。倒是一些学者、还有年轻的慕名者、她过去患者的后代来纽约后来看望她。给她送来布鞋和一些河南小吃。（鞋子太小我穿不上，高妈妈给我一些小吃让我尝尝。）

三十多年前，高妈妈挽救过一位难产的妇女和她早产儿的生命，这一家人一直记得救命恩人高大夫，说没有高大夫，就没有咱家的今天。总是托人带来问候和小礼物。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很简单，谁对我真心好，我就对谁真心好。谁管你什么反华势力。

昨天，我太想念高妈妈了，拨通了看护小熊的微信视频。看到高妈妈精神很好，我委屈的眼泪要出来了，因为我拥抱不到她，握不住她的手，闻不到她头上洗发水的味道。我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就好像把老妈妈拥抱在怀里。她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害怕，再拥抱不到她。

这些年，每次见到高妈妈，都让我激动不已，总有所收获，回来总是“奋笔疾书”，记录下她所说过的小故事、一些有趣的经历，同时记录下她晚年生活

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字，是我对高妈妈的观察和感受，我总是寄给高妈妈的老朋友《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发表，随后许多网刊都会转载。我的老师高伐林先生特别将《君子之交淡如花……我和高耀洁老妈妈的花缘》推荐在他博客里给他的粉丝们。他说：“这篇写高耀洁的散文让我莫名感动，推荐给好几位朋友们看，他们也觉得很感动。”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听到老师的夸赞，真得让我扬扬得意。我觉得我的文字不是那么好，贵在真，怎么想怎么感受就怎么写。

回头看看，我写高妈妈的文字有六、七篇，四万多字，出本书不够。我就一直想着整理出来，形成一个小册子送给高妈妈，也可以送给喜欢关心她的朋友。这里只是我眼中的高妈妈，不是那个传奇的英雄，勇敢的战士，不顾家庭儿女的强人。她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爱说话爱写作，有时笔划着骂坏人，有时悲伤流泪，有时无奈摇头的老母亲。我只希望，能够看到这些文字的人，认识一个单纯的、急脾气的、爱小孩爱花爱鸟、内心丰富、孤独多病的高耀洁老妈妈。

我知道，高妈妈最喜欢的是文字文章。她不在乎物质，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吃穿。温即可，饱即可。她的一生，救助病患无数，写作出版著作三十一部，足可以让一些吃着皇粮的作家们无地自容。疫情中她又加紧写作自己的病例书，她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是的，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我用文字插成的一束鲜花，献给她。算是我用文字的形式拥抱，表达我对她的仰慕和爱。我只是想让老妈妈高兴，我喜欢看到她满脸笑容。

小宋(高妈妈总是这样称呼我)

依娃

目 录

序： 谭松：一颗永远闪亮的星.....	3
自序：依娃：一点心意.....	7
一， 纽约拜访高妈妈.....	12
二， 高耀洁：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28
三， 中国母亲高耀洁.....	41
四， 纪念高耀洁医生投身救助中国艾滋病二十周年.....	48
五， 祝贺高耀洁医生九十岁上寿.....	50
六， 我的高耀洁妈妈.....	52
七， 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	59
八， 君子之交淡如花——我和高耀洁老妈妈的花缘.....	67
九， 2020祝在纽约的高耀洁妈妈母亲节快乐！.....	76
附： 高耀洁：祭李文亮医师.....	83
附： 楚寒：不死的爱和公义——读依娃《我的高耀洁妈妈》、《中国母亲高耀洁》.....	84

纽约拜访高妈妈



高妈妈说：“我的书不卖，只送。”

我早几年就想去拜访高耀洁妈妈了，可是一直没有成行。原因有几，第一个我不知道高妈妈的详细地址，打问一位曾经给高妈妈出版过书的编辑，说他和高妈妈失去联系了，他还说听不懂高妈妈的河南口音。第二来自于我对纽约交通的恐惧，在世界上地铁线纵横交错最为复杂的城市，我真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第三，我近几年都是跑回中国大陆采访大饥荒幸存者，回来又整理资料，拜访高妈妈的事情就一拖再拖。

我从没有见过高妈妈，但“认识”高妈妈。记得那是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典礼，当主持人白岩松念到高耀洁的名字时，当时已经七十六岁的高妈妈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白岩松怕老人走不稳，上前去扶，高妈妈摔了一下手，那意思是：“让俺自己走！”逗得观众们都笑了。她就那么一步一阶，一阶一歇自己走下来，小小的个头，却顶天立地般的站在颁奖台上。她自费调查艾滋病的事迹，获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她接触以后我才明白，文化大革命时，她被强迫跪炭渣，膝盖留下后遗症……几年前，我从网上购买来她所著的《血灾 10000封信》，为她所揭露的中国农村血祸所触目惊心，又为她不辞劳苦，以年迈之身调查艾滋病源、援助艾滋孤儿、呼吁关注爱滋群体而感动。我在网上看过很多高妈妈的录像，她对着镜头喊：“我没有爱滋病，我家人也没有爱滋病，我管那么多干啥来？我看那些小孩可怜，小小的年纪，输血得了那病，就死了。咱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吗？”每每说到这些，高妈妈总是老泪纵横，令人心痛不已。

每次看高妈妈的录像，总是让我泪流满面。为无辜的爱滋病患者悲伤和痛心，更是为高妈妈的悲天悯人的高贵品德和伟大的母性所深深感动。我不想称她教授，如今只拚职称待遇，只争经费名利的教授满街跑。我也不想称她医生，如今不见红包不开刀不救人，手术台上还让病人加钱，白衣天使变成了黑心狼的医生到处都是。我只想称呼她：高妈妈。因为，她是那么善良，让每一位来郑州家里求助的老人孩子吃上家常便饭。因为她的爱那么博大，她爱每一个爱滋病患者，给他们送药、送食品、送钱、送衣服。因为，只有母亲对孩子才会有这样厚重的慈爱，只有母亲才会有这样不索回报的付出，只有母亲才会流下这样心疼孩子的泪水。

我只是高妈妈的一位普通读者和敬仰者。我想见到高妈妈，拉着她的手，

和她拉拉话，听听她的声音，看看她的样子，陪伴她一日半天，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八月底的一天，请一位总编介绍，我联系好高妈妈，坐上从波士顿去纽约的大巴，专程去看望高耀洁妈妈。

非常体贴人的高妈妈

从我所住的法拉盛转了两次地铁后，在纽约好心人不断的帮助下，我乘坐一号地铁终于来到3333BROADWAY——一座红色砖楼前。因为高妈妈耳朵背，我给高妈妈的护理打了电话，她告诉了我高妈妈详细的楼层和门牌。那座红砖建筑真大，光电梯就分A、B、C、D几个，虽然门口的保安热情地给我指点方向，我还是惴惴不安，坐电梯上了八楼，不知道该往那边去。扭头间，就看见一位八十多岁，身穿黑白碎花的老太太坐在门口，短短的头，笑迷迷的，慈祥的就像我们老家村头坐在老槐树下歇凉的老婆婆。那不是我想了好几年要来看望的高妈妈吗？



高耀洁教授每天都在写作

“高妈妈！”我连走几步，弯腰拥抱住高妈妈。一下子，我的眼泪禁不住涌出来。激动又难过。如果不是高妈妈长年坚持艾滋病的调查，不坚持喊出“血液传播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坚持著书写作奔走演讲，告诉世人艾滋真相，她不会以耄耋之年流亡异国他乡，孤独地生活在纽约曼哈顿这栋公寓里。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次见面，也就会永远是陌生人。

“高妈妈，我来看看你！”

那一刹那，我看见高妈妈的眼睛里也蓄满了泪水。我能读懂，那是一个老人远离故国家园，远离儿女孙儿、独居繁华都市却异常孤独的委屈和无奈，痛苦和无助。

“我怕你找不着，就坐在这等你。走，咱进屋。”

一口河南话，听高妈妈这么说，让我特别感动。她的腿脚已经很不灵便，她得用扶手椅慢慢推出来，然后坐在扶手椅上等待。

三句话不离艾滋病的高妈妈

进了屋子，我环视四周，高妈妈独自一人居住的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桌子、书架、床都是东拼西凑的，客厅连一个沙发都没有，墙边靠着几把折叠椅子，是准备偶然来客多的时候，给客人坐的。窗台上摆放着的几盆绿色盆景，给老人的屋里增加了不少生气。高妈妈特别爱花，这些花都是来看望她的朋友们赠送的，有金钱树、菊花、兰花，有一个叫不上名字。我说：“是不是叫凤尾？”高妈妈说：“你看，就像个鸟的尾巴，就叫凤尾吧。”六点以后，看护下班回家了，只有这些花默默地陪伴着老人。

和高妈妈面对面在简易的折叠桌子边坐下，请看护给我倒了杯茶后，我就和高妈妈聊起来。虽然听力不大好，但高妈妈很健谈，嗓音宏亮，记忆清晰，基本上都是她说我听。也可以想象，老人平时太寂寞了，除了看护，难得有人来陪伴她说话聊天。我告诉她我小时候的邻居是个河南人，所以我听河南话没有问题。

高妈妈被人们誉为“中国防艾第一人”，艾滋病专家，到明年就投入整整二十年了。高妈妈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张口就是艾滋病问题，这是她最忧最愁最揪心的事情。她说她多年前开始调查艾滋的办法是“用钱开路”。“我是九六年四月开始的，我去调查，雇佣出租车，一天要五百块钱。还要拿点东西，你不拿东西，那个艾滋病人就不和你说话。我一般就拿那个方便面，一箱一箱的。有一次，我去王楼看艾滋病人，我对司机说：‘停车，我要和艾滋病人说说话。’我下车对那个人说：‘你身体看上去不好。’咱也不能说是艾滋病，这是一个中年妇女，问她话她也不说，啥也不说。车子直接开到村里。那个中年妇女从家里出来了，拿着她的化验单给我看，她说：‘我也是，我也是那病。’我让那个小孩给她一箱方便面，她想拿都拿不起来，没有力气，我让小孩给她送进屋里头。我再问，她就给我说了：‘俺得病了，得了那个病。’我问她：‘刚才我问你，你咋不说呢？’她小声说：‘村长不让说。’那方便面多轻呀，一个女人就病得拿不起来。我给每个小孩一包方便面，吃着将方便面箱子帮着拿回家。”如今方便面城里人都不屑吃了，在贫困的农村依然像点心一样金贵。

听到这里，我心里暗暗发笑，我下农村采访大饥荒幸存下来的老人，和高妈妈使用的“同样的手段”，给他们送点茶叶、桃酥、白糖、零用钱，他们就问什么说什么了。一来农村的老人特别老实，很少有外面的人来询问关注他们，二来他们也的确需要实惠的物质帮助。

“我去那里，人家不让接待生人，特别是高耀洁。如果在村里他们可以抓，如果跑到大路上他们就不能抓。农村那小孩，才六、七岁，会吸毒吗？他也不会卖淫嫖娼。最坏是那个河南宣传部，一直捂、一直捂，一个村上至少有七个到十个艾滋病，硬说河南没有一个人得艾滋病。逼迫着我改口，那个河南副书记到我家去了四次，我死也不改口，有就是有，多就是多，李长春、李克强在艾滋病上有罪。



来看高妈妈，是我多年的愿望。

我是这样的，我就坚持我的意见，我不会跟人打架，不会举牌，更不会静坐，我就写，我有一本故事，就是一个一个的病例，一百多个。我是打掉牙往肚里咽，我想我既然已经下农村了，就应该撑到底。”

高妈妈介绍说，中国调查艾滋病医务界的只有四个人，其他不少人是捞钱

的骗子。第一个叫孙永德医生，河北省防疫站的，是位主任医师，他把艾滋病疫情反映到国务院反映到卫生部，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孙永德最后去世了，有人说是气死了，有人说是被害死了，连高妈妈也不知道详细情况。当时的卫生部陈部长临终的时候说：“如果早听孙主任的话，艾滋病不会到这个地步。”到了九五年五月，站出来河南周口单采血浆站的副站长王淑萍，把问题直接捅到北京，干到十一月才半年，就被开除了公职。王淑萍的丈夫是防疫站站长，她没有工作了，家庭破裂离婚了，她被迫跑到美国流浪，带着她的女儿。2000年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进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检查病人，抽血化验这时才知道农村的无名热怪病是艾滋病。桂教授不受政府的欢迎。

十几年以来，高妈妈放弃退休安逸舒适的生活，丢下一生相濡以沫忠厚老实的丈夫，迈着一双年幼时被缠裹过的小脚，奔波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十几个省的上百个村庄，给那里的农民送去药品、书籍、简报、衣物。让那些在病床上等待死神降临的不幸者看到最后一缕光；让那些在苦难的沼泽中挣扎的人，可以牵住一只救援的手；让那些死去父母双亲的天真孩童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可以扬起头来叫一声：“奶奶！”不使他们绝望，这个世界上，还有给他们小脸擦去眼泪的人，给他们递上馒头包子的人，还有爱他们的人。

高妈妈眼里的杜聪

杜聪，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办者——被著名文学家白先勇先生形容为“艾滋炼狱里的活菩萨”。这个出生在香港，在美国哥伦比亚和哈佛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华尔街银行家，就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机缘，看到了华中地区有那么多无助的艾滋病患者。随后在高妈妈的引领下，放弃了美国金融界本该有的前程，高薪工作和安逸生活，成立了智行基金会，跋山涉水在乡村行走调查，先后帮助了近二万多名艾滋遗孤。他说：“我救不了艾滋病患者的命，但我能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学，我要做一个救海星的人。”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张照片：在2012年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艾滋病研讨会期间，到了下午五点多，参加会议的杜聪和年事已高的高妈妈都疲倦之极。杜聪坐在椅子上手扶脑袋闭目小憩，体力不支的高妈妈则以自己的五、六本书为简易枕头，盖上外衣，侧身躺在三张椅子上打个盹儿，少做歇息。还有会议，还要发言，还要大声的揭露和呼吁。这副照片不知是谁拍下的，令人感动和温暖，还有

一丝心疼。杜聪和高妈妈既像感情浓浓的母子，更是如一对不畏艰难险阻冲锋在艾滋大火中救火的消防队员。



一张令我非常感动的照片

长期以来，我对这位救海星的善心人钦佩不已。但是高妈妈眼里近距离的杜聪又是怎么样的呢？

高妈妈记得第一次杜聪去拜访她是2002年元月23日（高妈妈的记忆力令我非常吃惊，许多重要的日期、时间她都记得一清二楚。）高妈妈一看杜聪洋里洋气的样子，一看就是外地来的人，不敢把他领回家，害怕有人把他们都抓起来审问，就领杜聪到外面一个小店一边吃一边谈了好几个小时。随后杜聪就跟着高妈妈在农村实地走访调查了一年。

十多年前，刚开始跟随高妈妈走访艾滋村的杜聪自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风土人情，麦苗韭菜分不清，芝麻花叫成喇叭花，成天跟着高妈妈风尘仆仆的坐车到处跑。这是他人生从未走进的大学，从未上过的课堂。使他错愕不已的是，除了高楼大厦的纽约生活富裕的香港，地球上还有人如此贫穷可怜，食不果腹，衣难暖身。高妈妈回忆到：“杜聪是香港出生的，美国长大的，不知道咱农村的事情。我们去乡下，那老母鸡在岸上‘咕咕咕’地叫，几个小鸭子下水里玩耍。杜聪一见发表言论了，把他急的，卷起裤腿就要下水，还喊着‘鸡妈妈着急了，鸡娃掉水里了！鸡娃掉水里了！我去救它们上来！’一块去的复旦大学高燕宁教授

说：“你赶紧把鞋脱了，把鸡娃娃捞上来。”把俺几个惹得笑得肚子疼。杜聪鸡娃娃鸭娃娃分不清。”说到这里，高妈妈开怀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哈哈大笑。一件小事，倒是看到了杜聪的善心，能救水中鸡娃的人，当然会奋不顾身的去救水中的孩子。

调查艾滋病工作，充满了危险，主要是来自于当地政府的阻拦堵截。当官的都害怕暴露真相，害怕问责，害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有一次，高妈妈、杜聪、高燕宁三个人坐车去了一个村里，高妈妈就看见不时有人进门探望，不一会，又有人探头探脑的张望。高妈妈是河南本地人，很熟悉当地的情况，本能地感觉不对头。高妈妈说：“高老师，咱走吧，气候不对。”没想到“反应迟钝”的杜聪说：“不要走，不会下雨。”急得高妈妈高燕宁两位直出汗，她们两个说：“我们走，你自己在这里吧。”拖了一会，杜聪跟着他们两位跑出去，一下子就来了三十多个警察和民兵来抓他们。杜聪害怕了，拍着司机的肩膀说：“快开！快开！”高妈妈劝说：“小王，你可不敢快开，咱碰到树上死了怎么办？”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艾滋病是因为吸毒和不良性行为所致。高妈妈说：“我和杜聪见到一个妇女，叫齐桂花，家里只有一点点白面，和一点面水就那么充饥。政府说人家是吸毒快死了，我们至少去过她家三次，拿出来很多照片。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到哪里买毒品吸？”

杜聪的善行，使他屡屡在香港和台湾获奖。在前不久获了奖后，他把自己的所得奖金发给每位工作人员1000元奖金，他说我要钱干什么？听高妈妈说杜聪在洛河居住的地方只有八十多平房米，因为住旅社会花钱，有一间小房子就不用花钱了。

孩子们的“杜叔叔”“杜老师”还没有成家，没有自己的孩子，他的全部时间、精力、感情和爱都给了那些失去父母、无法生活、无法读书的孩子。杜聪所做的慈善公益事业，救助过二万多孩子，这些孩子中间能出来十分之一，能上大学中专。但是国内的媒体都见不得他，因为他常常暴黑，这里有多少艾滋孤儿，那里有多少艾滋孤儿，政府不愿意让他说出来。高妈妈感叹地说：“我和杜聪共事了十四年了，有些人弄公家一点钱，让农村穷孩子到国外玩玩，是一时的。但是教育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我成天想，杜聪走的路是对的，救了很多中国的艾滋遗孤。”

前不久看关于杜聪探访艾滋病患者的片断，如今，原本西装革履的华尔街白领也能坐着三轮车颠簸下乡，也“很懂行”地提着油罐子、米袋子送到农民家，用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说：“大米，大米。”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远比蛋糕月饼实惠得多，可以让一个贫困的家食用很多日子。他并设立了环保袋工厂，在上海开了面包店，让那些艾滋感染者能有就业机会能自食其力，从而找到做人的尊严。

有幸获得高妈妈给我的一本《爱在村庄孩子的心里》，夜晚灯下阅读时，多次为杜聪的菩萨心肠人间善行感动涕泪。禁不住一次次的问：这个人心里有怎样的爱？可以抛弃一切去救助这些艾滋孤儿？

可以说，杜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善良又智慧的天使！身材有点胖的天使！

高妈妈回忆自己的医生生涯

“你看看我这个胳膊，不一样粗。”

高妈妈伸出两条皮肤松弛的胳膊给我看让我摸，果然右胳膊比左边粗壮一些，我不明白为什么。高妈妈说：“我做手术，我做过好多手术呀，右边用力多，胳膊就成这样了。”说这些话的时候，高妈妈流露出几分骄傲和自信。因为这条变粗的胳膊不但曾经接生过数不清的小生命，更是救活过不少癌症患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保住母子生命的家庭还记得她、感谢她。

我很喜欢听高妈妈说话，因为她的一生是那么的曲折和丰富。高妈妈最早是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她医术高超，总是急病人所急，忧患者所忧。那是一九六零年，结婚多年的李贵荣不能生孩子，在高医生的治疗下，一连生两男两女四个娃娃，她来感谢高妈妈说：“高医生，我给你一个吧。”高妈妈说：“我要那吃嘴货干啥？我又不是没有小孩？”

高妈妈做了21年妇产科工作后，她觉得搞妇产科永远不能出人头地，没有新的发展。1974年改行收癌症患者，接受癌症病人。癌症是绝症，癌症病人如果治不好，病人死了，家属不会埋怨医生。所以她和病人的关系非常好。

高妈妈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一段和病人交往的往事：“有一次我和病人的爸爸吵架。我书上有写，我收了一个卵巢癌病人，叫马淑娥，是颗粒细胞癌。我能拿下来，做完手术，我给她插两个管子。我给她爸爸说：‘我给淑娥保存了子宫、一侧卵巢、输卵管，可以结婚生孩子，你把住院费交了。’结果这个爸爸说：‘癌症我们不治了。’我问：‘有希望治，怎么不治了？’这个爸爸说：‘是我闺女，我说了算，不是你闺女。’他账也没有结，就拉着病人走了。我就去妇联告状，妇联一把手不在，二把手在，她误会了，以为是我的亲戚，结果县妇联、乡妇联、都去马淑娥家。对她爸爸说：‘你明天不把她送医院，我们就在这里办公了。’马淑娥给送回来了，我可生气了，和她爸爸吵架，马淑娥订婚了，给了五百块钱彩礼，他女婿说：‘爸爸，你拿上二百块钱交住院费。我结婚以前还给你。’她爸爸说：‘不行，我盖房子哩。等着娶儿媳妇哩。’我问他儿子多大了，我问：‘马老汉，你儿子多大了？’他说：‘十三了。’你说气死人不？结果她住院治疗没有花钱，有的人心好，公费医疗，就说：‘高主任，你开药，用我的名字开，打给马淑娥。’病好就出院了。”

在高妈妈的精心医疗下，马淑娥康复了。结婚后生了个小男孩，过了两三年后，高妈妈都忘记了这件事情。春节的时候，他们一家，马淑娥和丈夫孩子，由老爸爸领着拿着柿饼花生来给高妈妈拜年，一进门老头就喊：“高主任，你闺女来看你！”高妈妈不在，医院护士长揶揄到：“哪是高主任闺女？不是你闺女吗？”那是八二年的事情，马淑娥十九岁，从那以后，她的病也再没有复发。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事情，高妈妈讲述起来却让人感觉到历历在目。

高妈妈所在的省级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拥有五、六百张住院床位，她担任妇科的主任，又是教授级，但她不是在门诊部就诊，就是在住院部查病房。有时老同学来找她，转一圈找不到，再转一圈还是找不到。特别是有一个的老同学来住院，怎么也找不到高妈妈，因为她们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见过面了。另外一个同学常见高妈妈，她就说：“为民，这科室里高主任是谁？就是那个小脚。”“那个？主任？”“就是。”最后两个老同学咯咯咯地跑到高妈妈的办公室，大呼小叫道：“老天爷！你咋熬成这个样子了？！”眼前这个主任衣服头发都不讲究，土里土气的貌不惊人，实在没有一点当官派头。高妈妈毫不客气地对老同学说：“老天爷有眼！小脚不一定没技术。”

高妈妈说：“俺出身不好，大地主成分，不能入党入团，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我自杀过，挨打受伤做过大手术。”高妈妈撩起衣服，让我看她腹部留下数寸

上的刀疤。“等老毛死后，在业务上我有成就，得过国家二等奖，在河南就是不得了了。在我五十六岁的时候，被提升为国家终身教授。还是河南的人大代表，文史馆馆员。如果后来不搞艾滋病调查，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高妈妈自嘲道：“我就是个不识抬举的人。”

高妈妈的书只赠送 不卖

至今，高妈妈已经写了近十本有关中国艾滋病的书籍，大多由海外的出版社出版，广为流传，传播深远。是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来之前，我就想着买几本高妈妈的书，回去好好拜读。不想高妈妈早就签好字，放在一旁要送给我。我过意不去，说：“我买你的书。”高妈妈大声说：“你要买，俺就不给了。我的书我不卖，都签上名字了。”高妈妈送给我七本书，她刚出版的《高耀洁回忆与随想》、三本《镜头下的真相》是去年出版的，都签了名字，让我送给关心中国艾滋病的朋友。说起来也得两百多元，但我不敢违背老人的意愿，恭敬不如顺命。

高妈妈最喜欢谈的话题就是她的写作和书，因为那是她身处异国他乡孤独一人生活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她的痛苦也是她的快乐，是最大的折磨也是最大的慰藉，这些文字和图片是老人一生的心血和财富，她非常愿意送给每一个人。

高妈妈翻动着书对我说：“这本《镜头下的真相》都是照片，333张，我买了一千多本，一次四百，另外一次八百，我为啥给人没有那么大方？因为里面有英文，外国人要。联合国安理会一下拿走三百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政法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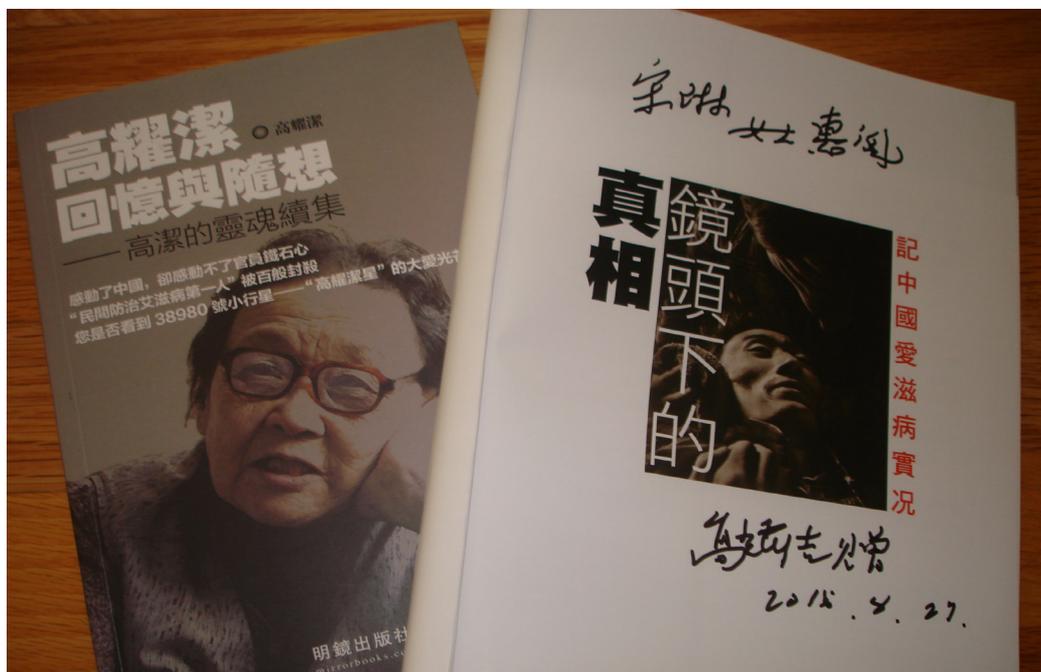
高妈妈说我的书不卖，只送。

都寄去了，回信都来了。我捐赠了书，他们给我寄来感谢信。这个是让人带给西安第四图书馆的。”

高妈妈不但免费赠书，还要自己承担邮寄费，特别是非常昂贵的国际邮寄费用。“我运这些书，运费很贵，特别是我运到国内。我想办法运呀，先到香港，再到悉尼，悉尼再到国内，转一圈。寄书可贵，花钱多，前几天，我给四川的谭作人寄去一本书，邮费三十六块，可贵，但他收到了。我要钱干啥？我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还活不活了？你看我的书从香港到纽约，纽约到国内，转着圈寄去，我给联合国三百本书，我不卖，送给他们，都签了名字。为啥来？我现在要钱没有用。”令高妈妈气愤的是，也有人骗她一些书，自己卖出去挣钱。

高妈妈的书桌兼饭桌上有两本赠书登记册，是用打印过稿子的费纸装订而成的，用背面画成整齐的表格，在上面登记得到过赠书的有：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智行基金会负责人杜聪、自由亚洲电台主持人北明、还有南京大学图书馆员陈远唤……等等。

高妈妈今年最新出版的《高耀洁回忆与随想》，她一次就购买了800本。那本《镜头下的真相》出版时，高妈妈说不要稿费，用稿费折合后用来购买书。有一个名字叫孙以韶的女士要给高妈妈三万元港币，支持她出书，这位女士不要出



珍贵的赠书

名，她给高妈妈写信来说：“高奶奶，我上高中的时候，看见你在电视台上，我想问我爸爸要点钱给你寄去，我一想，那点钱也不是办法。我现在工作了，我回家吃饭，把钱攒着，我把钱给你。”高妈妈不肯接受她的捐赠，孙以韶就把钱给出版社了，所以出版社就给的书多。等于又多了一批书。

光是给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就捐赠了300百本书，就是按照出版社给的作者价，加上昂贵的邮费也要差不多6000美元费用，不能说是个小数目。高妈妈说：“年初，我得了一个奖，刘宾雁良知奖，奖金一万块。我已经花了8000块，说不定我明天就死了，要那么多钱干啥来？我的钱又快花光了。再有钱，死了也带不走，但是我的书大家看到了，就了解了。”高妈妈的屋里还堆放这几箱书，她无担心地说：“还有二百多本，不赶紧送出去，我就害怕我死了，就变成垃圾了。”

在买书、送书方面高妈妈“大手大脚”，在生活方面对自己却很节俭。在卫生间里，我看见高妈妈使用的几条毛巾都用的快破了。护理为她买回食品，她也认真的检查收据，看看花费了多少钱，精打细算。高妈妈告诉我：“我这一生从大学毕业，一直到退休，到我出来，一年用一块钱的雪花膏，有孩子小的时候，用两块钱，所以对化妆品，我是一点不懂。我给人家钱的时候，我很大方，我觉得人家是个人，咱也是个人。我觉得你擦得再好，不等于你人格很高。我是这样，那怕我自己少吃点少喝点，要对老百姓好一点。我就这么大力量。”

“我明天就要死了，但我今天还没有死就要为中国无辜的艾滋病受害者呐喊，就要揭露出政府鼓励‘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泛滥成灾的真相。”这就是高耀洁宁为鸣死不为默生宁折不弯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境界。

高妈妈的生活、写作和遗愿

高妈妈的身体和任何垂暮老人没有区别，要依靠经常的看医生和每天吞服各种各样的药物维持。高妈妈目前有高血压、心脏病、大隐静脉血栓，经常摔倒等等病，不得不忍受着病痛和不适。因此，她也会悲观的说：“我是生不如死。”“有时，我晚上冷的打颤，盖上被子又热醒来，谁知道呀？”这把年纪，工作了一辈子，本该享受清福、含饴弄孙，安度晚年，却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一群讲听不懂的英文的人的大楼上。

就是这样重病缠身自顾不暇，高妈妈依然惦记着国内的艾滋病情况。“四川凉山那边，天天都在埋死人。政府说他们是因为吸毒，但是那里的人穷得没有饭吃，哪有钱买毒品？现在还有人卖血。我收集了很多资料，都是国内的人给我转来的。我现在身体不行，如果身体行，我就去四川凉山了。如果在十年前，我就去了。我要去看看怎么回事？”一说到艾滋病，高妈妈的小脚又想跑路了，可惜，她如今上卫生间都得用手扶椅，跑不动了。

高妈妈当了一辈子医生，治病救人，年纪大了，逐渐成了“看病”专业户，先是换上了一口假牙，前不久全身皮肤发痒，害得老人家一夜起来六七次，用食用盐洗。好在在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的关照下，保险公司给高妈妈派了三个全天护理，轮流值班，每天九个小时，给高妈妈做家务、洗衣服、做饭、洗澡等。高妈妈的饮食非常简单，午餐一碗豆腐鸡汤，一个小包子，晚餐一碗面疙瘩蛋花汤。白天还得睡几觉，其他时间都是用来写作和上网浏览新闻。

高妈妈指着自已卧室的小书架说：“我这一辈子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十七本是专业的医学书妇科书，十二本是关于艾滋病的书。我现在还在天天写作。必定是奔九十岁的人了，有时候脑子清亮，有时候什么都记不起来。我目前写的一本书，还没有写完，我才写了二十六节。我已经写了委托书。如果我死以后，委托黎教授帮助出版。我写了望蒋杆、反右、大饥荒，现在有材料问题。我写的太晚了，有材料问题。我写的太晚了。八十岁以后，脑子不行了，我应该早些写。我喜欢写真实的事情，不喜欢查资料，如果查资料，等于天下文章一片抄。我说，中国现在要转方向，和树一样，要把根给除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毛泽东。”（补充，这本《悲惨年代》以后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每到夜晚，夜深人静，高妈妈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什么，就翻身起来，用笔写下来，想起什么增加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对一个中青年写作者来说是职业习惯，可是对一个老人来说起来写完，再睡下都是非常困难的举动。高妈妈的写作犹如用身体匍匐前行，字字留下痕迹，句句凿动人心。

说到毛泽东在延安种鸦片，高妈妈背了这么几句：“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五亩地来两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可惜我记录的也不完整。高妈妈目前写作的是揭露毛泽东统治时期暴行的，有一部分内容刊登在《纵览中国上》，比如最新的《钢铁的故事》《吹嘘浮夸害人不浅》等。

对自己六十九岁退休后所从事的揭露艾滋真相事业，高妈妈无怨无悔。她说：“如果我不钻进这个窟窿里，不得国际奖，我写写稿子，讲讲课，就俺俩口的生活也蛮好的。俺两口是医生，儿子是教育界的教授兼系主任。人家对我说，你得了奖，买房子。还有人让我买汽车。我说大家都有房子了我再买房子，大家都有汽车了我再买汽车。现在我觉得人命最重要。”国内也多次让高妈妈回去，但高妈妈不敢回去，害怕政府的脸色初一十五不样，想变就变，在那样的环境下完不成她的著作。

“我老伴是2006年死的，八十岁。他得了咽癌，可快了。他比我大一岁半。我死了以后，我给儿子安排了，把我的骨灰和他爸爸的骨灰撒到黄河里去，就完了。”

在纽约，我陪伴了高妈妈短短的两天，说话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少于十个小时。有时我贴着她的耳边大喊大叫，为了让她听清楚。有时，我们又你一言我一句的在纸上笔谈。期间高妈妈背诵了好几首古典诗词，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加上高妈妈的地方口音，我都无法记录下来，颇为遗憾。那天，看护六点下班走了，我在纸上

写到：“高妈妈，我想多陪你一会，晚点走，可以吗？”高妈妈说：“好！你来我可高兴，说说话可高兴。”我的心情很是矛盾，想多陪伴高妈妈，和她聊聊天，又很害怕打扰她的休息。



高妈妈的花，高妈妈的宝贝。

墙上钟表的指针不客气的指向八点，我得告辞了，去坐地铁回旅馆。

“高妈妈，那我走了。”

“那走吧，反正得走。”

我不舍得走，俯下身拥抱高妈妈的时候，忍不住在她的面颊上亲吻了一

下。说起来，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这么亲吻过自己的母亲呢。这一冲动的亲吻，让高妈妈知道，我是多么敬重她皇帝老子都不怕的硬骨头精神，又是多么爱戴她身为医生，一见病人就走不动的善良心肠。在门口，我不得不离开，我想哭，但强忍住了。我不想让高妈妈感到悲伤。

纽约，因为高妈妈居住在这里，成了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令我最牵挂的城市。感谢你！纽约！

高妈妈，我不久后还会再来纽约拜访你！

——《纵览中国》首发 —— Thursday, September 17, 2015

高耀洁：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 未来



高耀洁下乡送药

因为天气的关系，最近艾滋病孤儿连着死了6个，最小的一个才五岁。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高耀洁妈妈最近的一封信

我一时没有能力查清楚这六个孩子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最后告别人世的情况，但把他们的死亡纪录在这里，以此纪念！



想念曾经救助过的孩子们

九月底，各色菊花和金灿灿的南瓜已经上市了。月亮悄悄地圆圆地挂在天上，中国人的中秋节也来到了。

刚吃过月饼，因为高妈妈临时有点事情，让我去纽约见她。并说：“你不要嫌弃我的床铺简陋，委屈两天可以吗？”想想高妈妈去乡下探访艾滋病人，连破旧窑洞土炕破被都住过，那她现在有热水澡洗有抽水马桶用的公寓就是“豪宅”了，岂能多嫌？和高妈妈的护工通过电话后，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我就登上了从波士顿去纽约的汽车。

这次拜访高妈妈前后三天，比较从容。可以和高妈妈一起吃饭、聊天、上

网看文章和图片、探讨文字的修改润色。一老一不少(我正从中年往老年的路上行走着)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难忘的时光。我最爱看到高妈妈笑，满脸皱纹了，因为新做的假牙戴上不舒服，她就没有戴。笑起来嘴有点扁，慈祥可敬的模样，总让我想起我最爱的外婆。

当然，有“中国防艾第一人”之誉的高妈妈仍旧是“三句话难离本行”。三天里面，除去白天两、三次老人家必须的睡觉，高妈妈絮絮叨叨反复说到的话题总是中国艾滋病的问题，总是牵挂着故乡的艾滋疫情，惦念着那些感染艾滋病在痛苦深渊里的不幸者。我觉得高妈妈说的这些小故事、一段经历、只言片语、对一些人事的看法都很重要。就以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让关注中国艾滋病的人们、关注高妈妈晚年生活的人们得知。

高妈妈走访艾滋村的几个小故事

自从1996年4月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高妈妈花费了十多年走访了上百个艾滋村，有时一天就访问一百多个艾滋病人。总共和多少艾滋病人交谈过，给多少人解答过问题，给多少人送过药品、衣物和食品、送防艾资料与书籍。怕是高妈妈自己也无法统计出来了。按高妈妈的话来说：“我这里有关艾滋病的材料很多，每天给你讲10个故事，至少也能讲100天。”我这里先记录几个高妈妈讲述的与艾滋病人有关的“小故事”。



自费印刷艾滋病防治书籍，寄往全国各地。

(一) 奶奶 你家里有馍吗？

那是2002年，高妈妈从小学校出来，看到两个小孩就蜷曲在墙脚地上。小脸蛋很脏，冻得浑身发抖。他人告诉她，两个孩子的父母亲都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去年死去了，他们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高妈妈和两个孩子说话，两个孩子吓得挤在一起往墙角躲，不敢和陌生人说话。高妈妈蹲下和颜悦色地问他们一些情况，两个孩子最后鼓起勇气问：“奶奶，你家里有馍吗？”馍就是北方人的馒头，也是人们的日常主食。

高妈妈连说：“俺家里有馍，还有面条哩，跟我走。”

两个小孩一听有吃的，跟上高妈妈就走。把他们带到一个小饭馆，给他们一人买了一碗面，两个饿了不知道多少天的孩子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让坐在一旁看的高妈妈无比难过。

“两个小孩，一人能吃下一大碗，你看看，把孩子饿的。你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吗？”

说到这里，高妈妈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抹着眼泪，让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那些受苦的孩子。在手术台上，曾做过妇产科医师、妇瘤科主任高妈妈是训练有素麻利冷静的医生，不知接生过多少小生命，做过多少例肿瘤手术。但提到那些艾滋病遗孤，高妈妈就只是个心肠柔软、见不得孩子挨饿受冻的老奶奶。

好在，这两个孩子都被高妈妈送进了杜聪先生的智行基金会照顾，都进入学校上学了。我相信，这两个孩子会永远记得曾给他们买面条吃的“高奶奶”，会把一份爱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

(二) 大夫 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吗？

“我给你看看我的照片。”高妈妈把我领到她的电脑前，我们并排坐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文件，让我看她多年积累的上万张有关艾滋病的图片。高妈妈的图片分类有序，清清楚楚，按照“艾滋病病人”、“艾滋病孤儿”、“宣传演讲”、“得奖”等十多个大类分别，想看那些内容找起来一点也不费力。这些图片对高妈妈来说就是有些富贵女人的“翡翠黄金、珍珠玛瑙首饰”，无价之宝，是她多年积累的心血。

高妈妈指着电脑上的一张照片介绍到：“那时候，我到农村，还没有治疗艾滋病的药。我就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些治拉肚子、发烧的药，好几箱子。到

了农村，那好多人都来要，我都是免费发给他们。有一个中年人拿了药不走，就问：‘大夫，这药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还是问多少钱，不相信那药不要钱。又问要不要钱，我还是说不要，让他回家去。他想了好半天就问我：‘大夫，你是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呀？’我没有回答他，我不知道咋回答，他问了好几遍。多愚昧无知呀，最后我说：‘你赶紧回家，喝点水！吃药！’那人才走了。那时候，毛泽东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你看看。”



救助难产妇女，在这个窑洞过夜。

在中国，毛泽东依然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神，毛泽东像和小型雕塑更是小商小贩赖以生存的“红色商品”，毛的外孙女孔东梅因此大发其财，红色旅游韶山毛泽东广场更是人山人海，磕头烧香。有很多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高妈妈大声疾呼：“这一切的祸害都是毛泽东，让中国人没有人性了。如果不拉下毛泽东的神位，中国就没有希望，去毒要把这个老根挖出来。”在中国近代的惊涛骇浪大起大落了近九十载的高妈妈，虽然年老多病体力不支，但笔耕不辍，正在天天加紧写作《悲惨年代》，为揭露毛搞政治运动害人的罪行留下亲历铁证！

(三) 有外人进来了？

高妈妈这么多年来从事爱滋病的调查走访工作，没有资金没有助手就不说了。河南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捂住盖子、保住位子、留住面子，居然提出“有谁举报高耀洁，就给奖励500元。”本来应该得到政府鼓励、支持和表彰的工作，却处处受到打压和刁难，甚至威胁。高妈妈经常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去打那些“黑洞”“黑血站”——白天不开门，半夜才开始抽血。



血浆经济演变成艾滋病血祸

“后来他们改变了，白天不卖血，夜里十二点以后卖。在山东，我都去了，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没有第一手材料谁相信你？我和两个小伙子去的，我穿上个大褂子，捂住头，不然来个老太太被人发现了。好多人就在那里卖血，排着队挤。我带去的小伙子一照相，闪光灯一闪，糟糕了。（听到这里，我这听者紧张的要命，如果被那些黑血头发现有人照相取证，还不被打个半死不活，扯出胶卷，毁灭罪证。）我就听见有人喊：‘谁照相？有外人进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害怕，害怕把俺几个一起抓住了。但有一个农民老实，说：‘俺打的火，抽烟哩。’那些人就相信了，就算蒙混过关了。我们赶紧跑出来……第二天，我一量血压，升到200，量血压的人说：‘我的老天爷，你昨晚上当贼去了？’我赶紧

吃药，不吃药，就要死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高妈妈几乎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照片被报纸、杂志、电视、采访等所使用，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让外界了解中国爱滋病的真相。

(四)这张照片不是流氓燕和田喜妈

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妈妈提供了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河南扶沟县曲楼村，失去了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身亡的儿子的母亲和失去丈夫的媳妇，婆媳俩同时在高妈妈家客厅里痛哭流涕，悲伤不已。

但是网络上不少人使用这张照片，在很多文章和网站上发表，注释那个媳妇是流氓燕，那个老太太是田喜妈，这个媳妇和流氓燕都胖胖的，也就容易让人相信。但是田

喜的妈妈脸大得多，这根本不属实。高妈妈并不认识流氓燕和田喜妈妈，这种误传让高妈妈心里很不舒服。她只想做到艾滋资料应该准确无误，给读者可信可靠的信息，千万不能张冠李戴。



尉氏县卖血患艾滋病死亡农民的母亲和妻子在高耀洁家里哭涕

这张照片不是流氓燕和田喜妈，在此纠正。

有学识却可怜的医学博士生

对很多人来说，觉得自己不嫖娼不卖淫，不吸毒不是同性恋，那么艾滋病和自己没有关系。不要说文化水平低，没有基本医学知识的人群对艾滋病有种种误解和歧视。就连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对艾滋病有着奇怪和令人无法理解的看法。

高妈妈说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学医的博士留学生，他妹妹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死了。当时他哭着对我说，希望我能在文章上提起一下，也算是对他妹妹的纪念。后来我没有提他本人，只是发了一张他妹妹的照片（是他给我的）。后来他马上找我，让我把照片拿掉，因为他交了女朋友，不想让女朋友知道妹妹死于艾滋病。这么可怜的医学博士，竟对艾滋病如此认识？何况其他缺乏医学知识的人呢？这个小女孩死的太可怜了，她是因为输血感染的，她的父母都很健康。可气的是，给这个小女孩输血并不是因为她有病，而是因为早产，她父母要给她输血增强体质，你说有多愚昧。而且她家经济条件好，所以有这个条件。我看到照片上那个可爱的女孩，真是太可惜了。

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位医学博士生给高妈妈的来信：

“2005年妹妹因为水痘感染而住院，在焦作传染病医院检查后才得知，她感染的是HIV，是艾滋病患者！”

起初我的全家都不相信，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等来的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妹妹从艾滋病发病到最后临终，也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那时的我还是XX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学生，我们全家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她临终时的一举一动，我都历历在目，永生难忘。也许是冥冥中老天安排的，她去世的日子是在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因为怕歧视，怕被别人误解，我和爸妈一直都不敢公开我妹妹真正的病因，起初想要状告血站和医院，可是害怕声张有负面影响，也就只能在家里默默的流泪，一切都是因为“艾滋病”这三个字。后来，我们就搬走了，离开了我们生活几十年的河南老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人们常说：“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思想。”一个在美国接受以救死扶伤乐于助人为一个医生天职的博士生，因为交了女朋友，就以有一个因艾滋病死去的妹妹为羞耻、为不光彩、为见不得人的事情。令人觉得荒唐而悲哀，那经受痛苦而冤屈死去的小妹妹也难以瞑目吧。

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医者的道德良知，这样的医学博士，在未来是不是一名好医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河南出了个高耀洁

在高妈妈从事爱滋病调查和宣传的最后几年，处境越来越艰难。河南省副书记陈全国几次找上门来，让高妈妈改口，以维护河南的形象。高妈妈丝毫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你们说农民是吸毒是性传播艾滋病，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吸毒？哪有钱嫖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我都要说真话。爱滋病，有就是有，我看见那么多，我不会说假话。”政府派有专人轮班守候在高妈妈家小区门口，不让朋友和媒体找她，电话和电邮也被截断，如同软禁。

那是一个冬天，高妈妈看到楼下有两个男青年已经常守在她的楼下，冻得鼻涕不停的流。高妈妈于心不忍，就说：“你上俺家来，喝点热水，吃点啥。”那人一听，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以为被高妈妈识破了，赶紧骑上摩托灰溜溜地跑了。看门房的老头对高妈妈说：“那是看你的，害怕记者来找你。”



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右为黎安友教授。

艾滋病血祸蔓延，家家死人，村村新坟一片一片，政府不是医治那些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人，不是救助那些失去父母没吃没穿没学上的可怜孩子，不是赡养那些死了青壮年的儿子、媳妇对天嚎哭悲痛欲绝的老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堵

住揭露出爱滋病真相的高耀洁的嘴。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封住高耀洁的嘴，河南艾滋病就解决了。

高妈妈说：“艾滋病是全国性的，只是程度不同。河北有一个姓李的化验员，是个胖子，个头不高。他经常吵……当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他到我家来说他那里一个村上就十几个得艾滋病的，都是输血感染的。结果把他给处理了，本来是化验室的，让他去看大门，一个月给一百块钱。他是越处理越吵，结果那里的领导聪明，给他一套楼房，一辆汽车，还给提了工资。本来是中专生，提成副高职称，给个党票。好了，不说了。所以，他来我家就和艾滋病人家属吵架，以后他就不来俺家了。”

和高妈妈谈话的高干说：“外省艾滋病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人家别的人聪明，都不说话，咱河南就你在吵！吵！吵！咱咋出了个你呀？吵个不停。结果弄的河南成了艾滋病第一了。”高妈妈不光是“吵！吵！吵！”还到记者招待会上去“吵”，到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吵”，到国内外大学去“吵”，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爱滋病。还根据她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十二本有关艾滋病的专著，成为中国防爱第一人，成为国际公认的艾滋病研究专家。

高妈妈 最没钱的专家 最富有的人

高妈妈纽约的家一室一厅，还算宽敞。但是她所使用的床、书桌、饭桌、书架、椅子等没有一件是光亮的成套的，都是老家具，破旧的家具。以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经验，知道这些家具多来自“车库拍卖”“院子拍卖”，要不了几个钱。

“你猜猜这个桌子多少钱？”

高妈妈考问我，我看桌子表面都破了。

“十块钱。”

“对，就是十块钱。刚来不知道能买到这么便宜的家具。看这个花架，也是看护捡回来的，人家不要的，这个也是捡回来的。好好的，都能用。”

早期的新移民，都有过在院子拍卖、车库拍卖购买老旧便宜家具生活用品的经历，我现在家里还有早十多年买来的桌子和台灯，两样加起来才二十块。可是高妈妈是中国防止艾滋病方面的著名专家、著名教授，获得过那么多国内、国

际奖和数万美元的奖金，连天上有一颗星星都被誉名为“高耀洁星”呢。高妈妈的生活如此简单和清贫，既让我钦佩，也让我有点心酸。

高妈妈“手大留不住钱”，就是今年初获得第二届刘冰雁良知奖，她为了购买自己出版的新书《镜头下的真相》、《高耀洁回忆与随想》就一次“挥霍”掉八千元。高妈妈走访研究写作中国艾滋病到明年就整整二十周年了，出版的著作有十二本，印刷发行量也有几十万册之多。但是她把应该获得的稿酬通通购买成了书，无偿地赠送给各个大学和各个城市的图书馆、赠送给朋友、赠送给素不相识的人。但却有缺德人要去在网上转卖了。

“你看，我银行里的钱不到两千块了。”

高妈妈拿出银行的账单给我看，就是这么个不富裕的人，还在许诺要出两千万美元帮助调查艾滋病的同行出版书购买书。



在大会之后记者们争先恐后的采访

高妈妈没有任何积蓄，她的房租、水电费每月近两千美元报销了，一个月近两百元的生活费，她认为年轻能工作时，拼命在中国干了四十多年，现在老了无用了，成了美国的负担，因此她在日常的生活开销自动紧缩，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

高妈妈是最没有钱的专家，最贫穷的教授。一辈子没有挣下花园别墅，没有购来名车豪艇，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别说女人们喜爱佩戴的金银首饰了。有两件比较“高级”的衣服挂在壁橱里，平时并不舍得穿，那是专门上镜头接受采访的服装。可是，我要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高贵的人。她无私的母爱和圣洁的慈悲比大海还深厚还宽广。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溢出眼眶。因为老人带给我深深的感动。

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夜晚，我和高妈妈修改了一天稿子。她有些累了，晚饭还是一碗鸡汤和一个友人送来的小花卷。高妈妈偏着头，用手扶住脑门，想着什么。我不愿意多问，我想她或许思念着远在中国的亲人，或者担忧着自己的病痛和未来越来越艰难的日子。但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老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后说：“艾滋病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我是看不到了，你还能看到。我真的很担心！”

一个年纪八十八岁的老人，一个走路需要扶椅的老人，一个洗澡穿衣需要人照料的老人，一个每天需要服用五、六种药片维持生命的老人。她思想的不是自己所承受的孤独和痛苦，忧虑的不是自己异国他乡无依无靠的处境。她担忧的依然是她的国家，她的民族，她的百姓。高妈妈真可谓一代中国老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典范。

前几天高妈妈给我的来信中说：“关于艾滋病，我说是个黑洞，确实是一个人意识不到的黑窟窿咚的大窟窿。很多人都认为我在艾滋病上做了些工作，其实那只不过是黑洞中的一点小缝。从整体来看，如此传染下去，若干年以后，中国的兵源要成问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比如，杜聪先生的基金会在正资助的9000个艾滋遗孤，在这些孤儿中，有632个是艾滋病患儿，约7%左右。这仅仅是一个小组织的发现，非孤儿中还有多少艾滋病儿童，只有天知道。另有国内同行告知我四川凉山因艾滋病死亡，天天埋人，根本没有人去管。”

高妈妈痛心疾首地说：“据王淑平医生1995年的统计，爱滋病感染者有500万之多，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翻了三倍、四倍，如今血祸还没有完全控制，还在蔓延发展，这样下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老了，做不动了。”

今天，世界各处的人都知道那位总是穿着粗布纱丽，满脸皱纹，终生在印度帮助穷人并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瑞莎修女，人们亲切地称呼她Mother Teresa。

今天，世界各处的人知道不知道这位总是穿着最廉价的衬衫，迈着一双年幼时曾经被母亲打着缠过的小脚，在六十九岁高龄后，走遍了广东、山东、陕西、湖北、广西等十几个省市，调查中国艾滋血祸，花费上百万元印刷防御艾滋病书籍资料，抚养过一百多名艾滋遗孤的高耀洁妈妈？可是，六年前，“大国崛

起” 的政府为了堵住这位老人的嘴，将她驱赶到美国，流亡天涯。

高妈妈一生信奉“但愿人皆健，何方我独贫”的信念，她做到了。我相信，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会知道，中国有个“Mother Gao. Yao Jie”

一篇小文章，纪念世界第27个艾滋日，并预祝高耀洁妈妈88生日快乐！

——《纵览中国》首发—— Monday, November 30, 2015

中国母亲高耀洁



高耀洁怀里抱着输血感染艾滋病儿邱抗抗

今年夏秋时节，我三次乘坐大巴从波士顿去纽约，到曼哈顿区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中国防艾第一人、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妇女领导者奖获得者、小行星38980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高耀洁妈妈。

高耀洁妈妈已经八十八岁了，如一棵历经风雨雪霜的老树，已是耄耋之年。她走路得使用挪椅，一步一步，蹒跚而行。她听不清楚来访者的谈话，得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她已经全嘴没有一颗牙，前两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当了一辈子医生，给人看病，现在成了看病专业户。”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将一小把大小不一的药片吞进嘴里，像吃黄豆一样。可是就是这样，高耀洁妈妈每天还是坐在案头一笔一划的写作。她不会用拼音输入，就在显示板上写字，电脑上就会显示出来，十分吃力。

如今这位并非作家的医学教授已经出版了二十九本书，其中有两本医学专著、十五本妇女保健书，十二本关于中国艾滋病的书。自零九年流亡海外后就出版了《我的防艾路》、《血灾10000封信》（广东人民出版社）、《揭开中国艾滋病疫情真面目》、《镜头下的真相》、《高耀洁回忆与随想》等，总共数百万字。



高妈妈所出版的艾滋病专著

早在一九九六年，已经退休在家的高耀洁妈妈，在一次会诊中发现一位姓巴的、年仅四十出头的农村妇女HIV呈阳性，此女有过输血历史。从此迈着一双年幼时被母亲打骂着缠过的小脚，走上了调查、寻访、宣传、救助艾滋病的不归

路.....。十几年以来，高耀洁妈妈放弃退休安逸舒适的生活，丢下一生相濡以沫的丈夫，奔波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十几个省的几上百个村庄，给那里的农民送去药品、书籍、简报、衣物。

让那些在病床上等待死神降临的不幸者看到最后一缕光；让那些在苦难的沼泽中挣扎的人，可以牵住一只救援的手；让那死去父母双亲的天真孩童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可以扬起头来叫一声：“奶奶！”不使他们绝望，这个世界上，还有爱他们的人。高耀洁妈妈就像艾滋病黑天漆地中一盏闪烁的油灯，孤立却明亮。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艾滋病无不与同性恋、淫乱和吸毒紧密相连。但是高耀洁妈妈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中国的艾滋病大多数来源于政府鼓励提倡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致富而导致艾滋病泛滥成灾。当地农民的顺口流为：“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仅仅一个上蔡县的感染者就有数万，有的家庭父子兄弟都卖血死于艾滋病，有的家庭夫妻孩子都受到感染，村里的新坟连成了一片。但官方为了掩盖血浆经济的罪恶，为了脸面和政绩，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不允许高耀洁妈妈走村串户的调查，并提出：“谁举报高耀洁，奖励五百元”的悬赏。有一次，高耀洁妈妈和两个同事坐车去了一个村里，就看见不时有人进门探望，不一会，又有人探头探脑的张望。高耀洁妈妈是河南本地人，很熟悉当地的情况，本能地感觉不对头。就说：“咱走吧，气候不对。”当他们的车刚开到大路上，一下子就来了三十多个警察和民兵来抓他们。同事害怕了，拍着司机的肩膀说：“快开！快开！”高耀洁妈妈提醒到：“你可不敢快



高耀洁医生最快乐的事情是给来访的客人送书。

右为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洁

开，咱碰到树上死了怎么办？”所幸有惊无险。

高耀洁妈妈在郑州小小的家成了不挂牌的艾滋病救助中心。她先后收到过全国各地一万五千封来信，最多的一天有五十多封，她总是一一回信有问必答。难以计数的艾滋病患者、艾滋病遗孤、老人、妇女上门哭诉求助。

高耀洁妈妈给他们免费看病，送药，留下他们吃顿家常便饭。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她留下几个艾滋病遗孤，她儿子回来非常不高兴。“给咱传染上病怎么办？我把他们送回去。”高耀洁妈说：“不许送，就在咱家过年。你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吗？”他儿子生气的走了，不愿意和艾滋孤儿一起吃饭。几个失去爹娘的孩子在郑州过了一个开开心心的年，走的时候，还带上礼物，他们一个劲的说：“谢谢奶奶！”高耀洁妈妈曾经以自己的工资、稿费、奖金等捐助一百六十四名艾滋遗孤上学，她说：“我少吃点少喝点。让孩子受教育，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说到这些孩子，高耀洁妈妈清楚的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多大岁数了，学习怎么样……她比心疼自己的孩子还心疼这些孩子。

高耀洁妈妈曾经获得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当主持人白岩松念到高耀洁的名字时，当时已经七十六岁的高耀洁妈妈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白岩松怕老人走不稳，上前去扶，高耀洁妈妈摔了一下手，那意思是：“让俺自己走！”逗的观众们都笑了。她就那么一步一阶，一阶一歇自己走下来，小小的个头，却顶天立地般的站在颁奖台上。她悲天悯人的医德和自费调查艾滋病的事迹，令闻者深深感动，获得台下数千观众热烈的掌声……

高耀洁妈妈曾多次受到前总统夫人、现国务卿喜拉莉的单独接见。在不久前喜拉莉的回忆录《艰难抉择》中这样写到：“高耀洁医生身材矮小，已经八十二岁了。她由于替中国的艾滋病人发声，并揭发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丑闻，而被中国政府持续骚扰。当我第一见她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的小脚——这双脚被缠过，并为她的事迹感到惊讶。”在给高耀洁妈妈的赠书上，喜拉莉亲笔提词：“高耀洁医生，我钦佩你代表中国人民的勇气和领导力，致以最好的祝愿。”

到了二零零九年，曾经的感动中国人物成了“敏感人物”，高耀洁妈妈的名字在电视、报纸、杂志上消声匿迹。她的电话、电脑时常断线断网，楼下有

保安换班全天候看守，不允许她见记者受访。并有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这样的高官登门拜访高教授，请她牵头写书《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以改变河南形象，提出“我们找几个人写，不用你动手，你署名就可以了，稿费全是你的。”高耀洁妈妈一口回绝：“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吸什么毒？小孩子都是母婴传播。我是个医生，我不会说假话。艾滋病有就是有！就是让农民卖血造成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人面前我都是这样说。”高官们对这位“不识抬举”、软硬不吃、名利威逼都不起作用的老太太无可奈何，气得大骂：“河南咋出了个你？”

带着有关艾滋病资料的三本书的硬盘，没有机会和亲人说声再见，高耀洁妈妈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登上了从此流亡异国他乡的飞机。她说：“我出来，就是为了出版我的书，把艾滋病的资料留给历史。不然，我那一天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了。”

远离了故土，远离了儿女，也远离了她离不开的艾滋病病人和那些她令牵肠挂肚的孩子。写作著书成了高耀洁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和生活内容，一字一划、一段一节、一本又一本，她以老迈多病的身体匍匐而前，要用自己的见证对中国这场世纪灾难鞠躬尽瘁，写到生命尽头。

“高妈妈，我买你的书。”我想买两本老人的书，拿回去好好拜读。

“我不卖，我的书都是送人的。我已经给你签好字了，我已经这个岁数了，要钱干什么用？”虽然心里不安，但恭敬不如从命，我接受了她的赠书。高耀洁妈妈最近光是给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就赠送了三百册新书，价值六千美元。老人并不是富翁，购书的钱是她不久前获得的一笔奖金，就这么“大手大脚挥霍”掉了。凡是来访的人，她都赠送几本书，让他们送人。孰料有人竟把赠书的签字页撕掉卖钱，太缺德了。往大陆邮寄一本书的邮费就是三十六美元。高耀洁妈妈对我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人知道艾滋病。”

俗话说：女人没有不爱美的。可是高耀洁妈妈却是个例外，她从来不化妆不涂脂抹粉。一年四季只用一、两元钱一袋的雪花膏，女性们使用的“瓶瓶罐罐”她没有一样认识。她也舍不得钱买好看的时装，到美国来领奖穿的衣服只值两美元，她说她是代表穷人来领奖的。她操着一口河南话对我说：“我获了几次大奖，奖金都印刷宣传单，买书送人了，宣传预防艾滋病用了。等人都有房子了，我再买房子。等人都有汽车了，我再买汽车。你不知道，那些孩子多可怜，

见到我就问‘奶奶，你家有馍没有？’我就给他们买碗面条吃，一人能吃下一大碗。”说到这里，高耀洁妈妈忍不住掉起了眼泪，我也跟着难过起来。

这位先后为中国艾滋病宣传救助投入一百多万人民币的教授医生，对人类健康事业有着巨大贡献的著名专家，却过着简单、清贫的生活。高耀洁妈妈曼哈顿一室一厅的家没有沙发没有电视，床、桌子、书架等都是旧货市场十块八块买来的。她银行里的存款还不到两千美元，却想方设法出钱给研究艾滋病的同行出书。有一个有钱人要出钱给高耀洁妈妈做一副假牙，她却说：“我老了，你不要给我装牙了，拿钱给XX出版书吧。”高耀洁妈妈行医一辈子，没有挣下豪宅名车没有万贯家产，在我眼里她却是最高贵最富有的人。高耀洁妈妈满头白发，

刻着皱纹的脸上写满了一生的苦难和坎坷，却是我眼睛里最美的人。“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位清末名医范文甫药房门上的著名对联，高耀洁妈妈用自己善良的品德、高超的医术、正直的人格做到了，无愧于医者——医人生命者这个神圣的称号。



高妈妈说：你们年轻人要多了解历史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其中一颗就是高耀洁星。她说：“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来日无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灿烂的群星里，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几级，肉眼是否能看见.....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把。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艾滋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我老了，走不动了。现在四川凉山艾滋病很厉害，放在十年前我马上去看看……”这么大年纪了，高耀洁妈妈没有对我多说自己的病痛和每天面对的孤独，操心的、放不下的还是关于中国艾滋病的种种事情。

“我是个受过苦的人，所以我永远同情弱者，同情受苦的人。”高耀洁妈妈个头不高，却是不畏强权敢言敢行的英雄。她手中没有武器，却是与艾滋大火搏斗抢救生命的战士。她有自己的孩子，却用博大母爱关怀每一位不幸的艾滋遗孤。

让我们关注这场中国艾滋血祸！

让我们记住这位正直的、勇敢的、悲天悯人的、圣女特蕾莎式的中国母亲高耀洁！

——《世界日报》首发—— 12月1日2016年



**让我们记住这位正直的、勇敢的、悲天悯人的、
圣女特蕾莎式的中国母亲高耀洁！**

纪念高耀洁医生 投身救助中国艾滋病二十周年



故国的人没有忘记高耀洁医生，试刊号《高姓文化》以她为封面。

二十年前遇一患，
石破天惊断艾滋。
从此奔走十四年，
走村串户救血难。

感动中国家却散，
年迈八十逼流亡。
日著回忆文上千，
夜忧遗孤泪水沾。

《纵览中国》首发 Friday, April 8, 2016

祝贺高耀洁医生九十岁上寿

兼祝贺她第三十本书
《悲惨时代——高耀洁回忆》出版



九十年前诞曹县，
高家长女爱书卷。
兵荒马乱逃河南，
步入医大愿人健。

文革挨整留病患，
年迈退休抗血难。
流亡纽约笔相伴，
《悲惨时代》留史篇。

《纵览中国》首发 Monday, December 19, 2016

我的高耀洁妈妈



我们一起看书稿，她说我修改。

高耀洁，人们对她有许许多多称呼——中国防艾第一人、防艾英雄、高耀洁教授、高医生、高主任、高老师。因为她年纪大了，又有众望，又有人称呼她高老（好像称呼中共中央高干）、高耀洁先生。而我，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还有我们无数次通信中，都是称呼她“高妈妈”。

“我出国是为了留下有关艾滋病的资料，不然，我一死就没有人知道了。”在连续获得美国“生命之音”等国际奖项之后，于2009年被迫流亡美国。她既不参加任何组织、基金会，更不去结识名人异士、游山玩水。除了必须的出门看病和购买生活用品，她全部的生活内容便是写作。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志在为后人留下历史真相。

从去年到今年的一年多，每隔两、三个月我都从波士顿坐上幸运星巴士去纽约，去看望居住在曼哈顿高楼上的高耀洁妈妈。有时带上两件换季的新衣服给她，有时带上一盆自己家繁殖的盆花给喜爱花的她，有时带点手工做的包子。而带的次数最多的是芝麻盐。从高耀洁妈妈的自传中得知她十多岁从山东省曹县高新庄最后能吃到的东西就是一罐芝麻盐。为了满足她对童年味蕾的记忆，我买来芝麻，小火上不停的翻炒，耐着性子炒得焦黄的时候撒些盐面，放在打磨机里一打，千千万万粒芝麻便粉身碎骨，香气四溢。坐在对面，看着已经没有牙齿的高耀洁妈妈掰一块馒头，蘸一下碟里的芝麻盐，放在嘴里吃得很香，非常满足，我看着也高兴。如今吃牛排、汉堡包的人们没有她这么土里土气的享受了吧？



高妈妈日常生活：吃饭、量血压、写作

高耀洁妈妈喜爱花，客厅里卧房里大盆小罐的养了十多盆。空闲的时候浇水，松松土，和花说说话儿，花是她最好的伴儿。但她却不喜欢剪枝花。今年五月，恰逢母亲节，我在马路边花摊上购得一束红色玫瑰，送给她，替她远在国内的儿女尽点心。不料，再一次见到高耀洁妈妈，她说：“你送那花，没有用，

一个星期就扔掉了。”原来，老人家一辈子节俭惯了，一束玫瑰花只能摆放一个星期就是浪费钱。

高耀洁妈妈从不涂脂抹粉烫发做头，却同样是一个爱美的女性，年纪大了，却总是穿得干净而整齐。起初我不知道她穿衣的习惯和爱好，送过她两件红色衣服，却从不见她穿过，但是体贴人的她也从来没有说过原因。从她的文章中我才得知：“我这一辈子，看过无数红旗、红海洋，害死多少人。我一看到红色就害怕。”颜色本来无罪，在中国红色却是暴力和权利的象征。一件黑白小格的衬衣，因为我买窄小了些，高耀洁妈妈巧手的护工剪下衣服口袋，将布缝制在两侧，修改加工。洗了澡，高妈妈说：“我穿上给你看看！”她穿上新衣服，手扶推椅站着，高兴得象过去过年才能穿上新衣裳的小姑娘，两只眼睛笑得弯弯的，那么慈祥，那么令人敬爱。

高耀洁妈妈一生从医几十年，从不佩戴戒指耳环，防止细菌带入手术室，病人受到感染，“卫生”和“干净”是从医人员的职业病。但是她的看护来自大陆农村，收入低，又担负一家人生活重担，上班下班的路上捡来大大小小的玻璃塑料饮料瓶，储存在高妈妈家，积攒多了再拿出去卖，以补贴家用。我这好事之徒看不顺眼，对高妈妈抗议：“不能让她拿进来，太脏，老人家抵抗力差。”高妈妈却说：“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了，算了，不说了。她很不容易，一天才能卖几块钱。我同情这些受苦的人。”这些从大街上捡到的瓶子招来不少蟑螂，高耀洁妈妈不停地喷洒杀虫剂对付，却一直没有抱怨和制止看护。我有两三次晚上睡觉也被叮咬的满胳膊红包，也忍住没有告诉高妈妈，不想让她对看护“采取行动”。

高耀洁妈妈经常很“吝啬”，因为她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很有限，不得不精打细算生活。一个看护告诉我：“我推着她去超市，那时候西瓜刚上市，一个要七、八块钱，她看了又看，想吃，又怎么都不舍得买。”我听说了，很心疼她，赶紧掏钱，请看护去买回来一个大西瓜，切开给她吃，也请看护吃。外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位获得过感动中国人物、国际妇女奖的名人连只西瓜也不舍得吃呢？高耀洁妈妈又是大手大脚“挥霍”的人，不会存钱不会算账。家里来了客人，熟悉不熟悉的都能得到她签名赠书，从不收一分钱。如果谁要提钱，她就假装生气，“那我就不送了。”就是今年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两次会议，高耀洁妈妈就捐出两百册有关艾滋病的书籍，少说也值三千多美元，都是她费尽心血稿费所得啊。吃几块钱的西瓜，她心疼钱，送几千元的书，她从不多想。忙忙碌碌了这

么多年，银行的账户里没有几个钱，真是不会算账的“傻瓜蛋”。她还常常笑话别人傻瓜蛋哩。

每当我迈进高耀洁妈妈的家，她总是说：“可把你等来了。”还夸张地给我作揖，她的看护开玩笑说：“高奶奶等你等得肝肠寸断。”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洗把一路的风尘，吃一碗看护做的汤面。高耀洁妈妈就催促着说：“走，咱去看稿！”她推着助步椅慢慢走，我跟在她后面，我向来都是听从她的“指挥”，我知道，老人家是个急性子，干什么都是马上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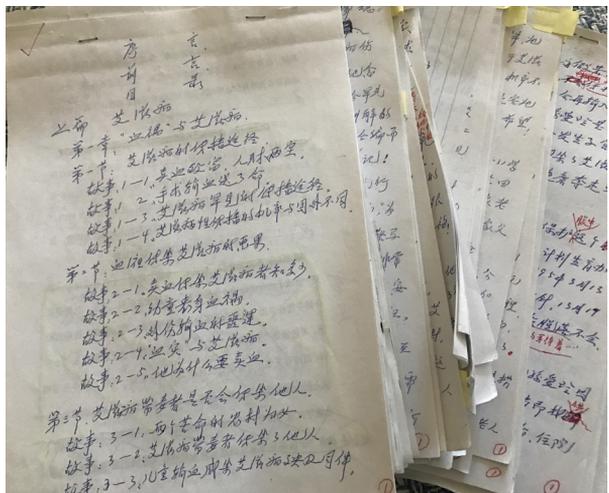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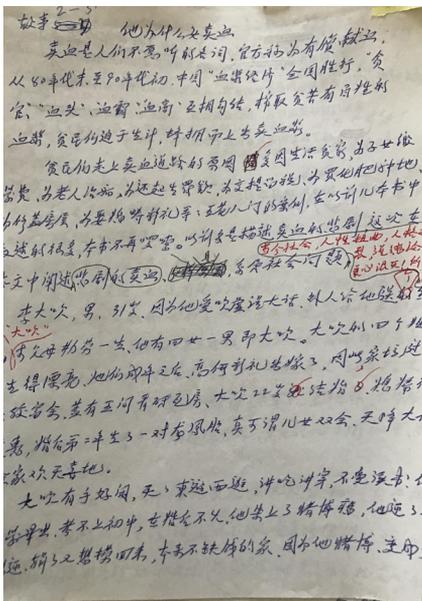
我和老妈妈一起看稿子

我和高耀洁妈妈一左一右坐在电脑前，她口述我打字，她说我修改。有时候又停下来讨论文字或者图片，嘻嘻笑笑，热热闹闹，不觉得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我对高耀洁妈妈说：“你太累了，休息休息吧。”她却说：“我不累，咱把这几张看完。”一干又是一个多小时，我这年青人坐得腰酸背痛，她这位老人家血压升高到200，得立即服药。有时候，一点小毛病，并不影响什么，我说：“算了。”她说：“不行，不行，要改。”我只有乖乖听话修改，一个握了一辈子手术刀的人知道“手术刀下，人命关天”，更是知道手中之笔书写春秋，差之毫厘，错以千里。笔比手术刀还重要，一刀治一人，一书传万心。这是我们在—

起最愉快的时光，也将是我未来最值得回忆的人生片断。

每次离开高耀洁妈妈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在屋里拥抱过她，出了门再拥抱，说一句：“过段时间我就来了。”她扶住助步椅，站在门口目送我。到了电梯口，我回头时，总是看见她在向我挥手告别。看到她的身影，多少让人有几分心酸。在纽约错综复杂的地铁下穿行，我都觉得身心畅悦，无比满足，好似一个贪财鬼背着一袋子金银财宝回家。想想我才明白，原来世界上并非只有男女之间的爱情能让人品尝甜蜜和美好。一份忘年交无话不谈的友谊，却也是让我感觉这般富足、这般珍惜，来回十多个小时的旅程，从不觉得累。

高耀洁妈妈时常对我回忆起老伴郭明久医生，她说：“老头活着的时候，怕我先死了，总是说，你死了，我怎么办？最后病了，又对我说，我死了，你怎么办？老头都没有了十年了。”失去相濡以沫伴侣后的十多年，大多数时间高耀洁妈妈在纽约流亡中度过，陪伴她的是纸、笔、电脑，一连出版了七、八本书，很多书里都收入了她和老伴儿的合照。“老头在等着我，我俩说好了，我死了把骨灰一起撒进黄河。”



高妈妈说：我出国是为了把这些资料留下来。

我不知道高耀洁妈妈是不是年龄最长的写作者，但我却知道她是最勤奋、最认真、最下工夫的写作者。她不止一次告诉我：“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睡不着，想起来什么就赶紧起来写下来，不写下来就忘记了。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如

以前了。”对一个年青人来说半夜起来不算什么事，但对一位因为自己已经不能穿脱衣服因此总是和衣而眠的老人来说，起一次身就是一次不小的折腾。高耀洁妈妈不会使用汉语拼音，在写字板上的一笔一划写非常慢，却织女织布般的，缓慢的一梭一梭来来回回，弃而不舍。就这两年多，以年近九十又多病体弱的身体写完另外一本书《悲惨年代》，是这位从没有加入任何作家协会医生的第三十本书，毫不夸张地说，是著作等身了吧，反正高耀洁妈妈个头也不高。

从1996年遇到第一位艾滋病患者，高耀洁妈妈就开始走村串户、调查采访、四处奔走，以老迈之身为数千万“血浆经济”受害者呼吁。“艾滋病有就是有，我不会说假话，见到省长、总理也不会说假话。”用北京话说，高妈妈是个较真的人，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她的较真劲儿，如今的她完全可以在国内享受离休专家教授待遇，四处受邀讲课挣外块，拿文史官员的补贴，出入达官贵人云集的地方吃香喝辣，儿孙围绕颐养天年。高耀洁妈妈从不粉饰抬高自己，她对我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出名，是我无意中遇到那个艾滋病人，才知道灾难那么大，我是被逼的。”一路走来，同行人的被开除工职，有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泄露国家机密”被关监狱。高妈妈说：“如果不是有些名望，早进监狱了。人一辈子，不可能名利双收。我最憎恨那些以救助艾滋病人之名捞钱的人！简直不是人！”

高耀洁妈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为人风骨，却让她的儿女受到牵连。已经七年没有见面的儿子跟随旅行团来到纽约，母子相见却只有两个多小时。六十多岁的儿子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面前大哭一场，紧紧拥抱，挥泪而去。写到这儿，我的泪水溢出来。我从来也不敢多问一句她们母子相见的细节，同为母亲的我知道那太疼太疼，说一次就疼一次。高耀洁妈妈被逼流亡加拿大的小女儿来信说：“因为你，我来到加拿大不能继续当医生，我吃过人家扔掉的过期食品，冬天用不起暖气，手指头都冻肿了。”说到小女儿儿，她说：“她已经肺癌晚期，肯定比我先走，怎么说也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能不难过吗？”说到这里老人家掩面而泣，悲伤得不能言语。我找不出合适的话安慰她，只有搂住她的肩，许久许久许久……

“我想回郑州！”

郑州是高耀洁妈妈的家，是她生活工作过五、六十年的地方。孤独的时候，忧伤的时候，她会突然这么说。是的，谁人不想落叶归根埋骨故土？是的，只要享誉中外的高耀洁妈妈象那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教授口口声声高唱

“爱国”，像艺术大师范先生那样聪明地发表声明：“我出国只是因为个人生活原因。”像有些投机分子隐姓埋名为了利益回到祖国的怀抱，大骂西方制度.....。但是，这位个头不高、身体多病的老人铁骨铮铮，孤独地、艰难地、度日如年地生活在纽约无法和美国人交流的大楼里。于她，钻一次狗洞，就会毁一生名誉，故宁死而不屈。

盛世中国、几个自信竟然容纳不下一个九旬耄耋老者，何其荒诞？何其悲惨？何其无耻？

感谢上帝的美意！让我和高耀洁妈妈这位年纪相差将四十岁的人相识交往，我们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相同的对农民和底层人的悲悯同情，我们都喜爱写作，而成为精神的朋友。她高尚的人格、坚毅的精神、渊博的学识、待人的真诚和宽厚更是成为了我今生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楷模。我对这位老人已经有了深深的爱和感情，她已经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高耀洁妈妈这位从小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人，经常说着话就背诵出一段，我大多听不懂，这次拜访她，我却听懂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最后说上一句，祝贺高耀洁妈妈的第三十本书《悲惨年代》出版！
祝贺高耀洁妈妈九十生日快乐！

——《纵览中国》首发—— Thursday, December 1, 2016

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



我一辈子写了三十本书

六月初，院里的芍药打起了肥嘟嘟的花苞。我安排好工作，安顿好家事，打算再从波士顿到纽约去看望已经年纪九十一岁的高耀洁妈妈。说起来，自去年九月，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她了。风雪不断的冬季、前不久儿子的毕业典礼、还主持一档费了老鼻子劲儿，收视率不算高的节目，让去看望高妈妈的时间一拖再拖。前几天，高妈妈来信说：“我很想你。”老人说想你的时候，就应该赶紧去探望。

走得那天早晨，却发现芍药们都按捺不住、争先恐后的盛开了，好像对我说：“我最漂亮，带我去纽约，带我去看望高奶奶，高奶奶会喜欢我们。”我徘徊于花间，剪下几枝粉色、几枝白色、几枝玫瑰色，还剪下几串串铃铛样的毛地黄，搭配在一起，还真有点天姿国色呢。

给高妈妈从波士顿往纽约带花并不是第一次，我带过君子兰、令箭荷花、兰花等，可都是有根有土的盆花，只要装好，并不是十分困难。但带剪枝的却是第一次，颇为不易。好在我从鲜花设计师那里学来一招，用纸巾浸透水包住底部，装进塑料袋，然后用比较厚的包装纸包裹，不让它受晒，不让它受压。一路用心保护着坐汽车、转地铁，不敢有丝毫大意带到高妈妈地处曼哈顿的家。

几年来，我已经成了这座红砖大楼的“常客”，闭上眼睛也能找到门。可就是进了门，高妈妈也不知道我来了。因为老人年纪大了，完全耳背。令我比较惊讶的是，我又看到以往多次看到的背影，一头银发，微微的驼背，坐在一台有放大设备的电脑前，认真地阅读着屏幕上的资料。自2009年无可奈何流亡美国，高妈妈身边没有家人，朝夕相伴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电脑。每天只要精神允许，她就坐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困难地写作，查看来自世界四面八方不同身份、不同年纪朋友的来信问候，也上不同的网站浏览正在发生的国际大事、中国新闻。她就好像一个不会享福、不懂享受清闲的农民，年纪再大，只要能动弹，总要干点什么活。

“高妈妈，我来了。”

我上前拥抱住我的高妈妈，她也抱住我。人们常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我和高妈妈不是娘俩，感情比娘俩还要好。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有着说不完的话，一起修改稿子、一起看新闻，一起骂毛泽东。说出来或许有人不相信，

高妈妈一口河南话，我也鹦鹉学舌跟着说，现在也能说得有些模样。如果有客人来访，我就自动上场，客串一下“河南话翻译”，基本胜任。

“我这两天写了篇文章，给你看看。”高妈妈说着打开文章，当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有关艾滋病的内容。二十二年来，高妈妈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五部、几百万字的艾滋病专著，但她始终关注的还是中国艾滋病问题。

高妈妈还能写作，令我欣喜无比，文章不但配了图片，结尾她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对她的写作，我总是很矛盾。自去年出版了《悲惨年代》以后，高妈妈告诉我她又有新的写作计划，内容包括计划生育、六四等。我曾搂住她的肩膀大声说：“你写，

继续写，咱再出版一本书。”一方面，我知道高妈妈一生的经历和记忆非常珍贵，在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更重要的写作是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可以打发寂寞孤独的时光，对她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我们一起看书稿，她说我修改。

不想去年九月我来探望她时，她刚刚患肺炎出院，浑身无力的躺着，头冒虚汗，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两眼无光。我坐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她看着我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了，我想我到时候了。”我一下子泪水潸然，头挨住她的头，安慰她说：“不会的，我还要来纽约看你呢，你不让我来了吗？”她摇摇头：“这次把你的君子兰带回去，等我一死，人家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固执的反对：“我不带，让花多陪陪你。”这盆君子兰是三年前我带来的，高妈妈责怪我花大盆小“虐待”花，让护工换了大花盆，使用了买来的营养土，待遇改变了，它也争气得生长得更茁壮丰茂。后来从客厅搬移到高妈妈的卧室，天天陪伴着老人，并贴上小纸条：“少浇水。”护工告诉我：“奶奶经常拨开，看

长新叶子了没有。”它已经是高妈妈的花了，我怎么可以搬回去呢？

“我的眼睛也有问题，医生说了，再不注意，以后就会失明。我再也不能写了。”听到这样的话，我不得不对着她的耳朵下“通告”：“高妈妈，那以后就不要写了，好好休息，听医生的话。”虽然有点遗憾，但反过来说就是再不写一个字，高妈妈也是“著名作家”，一辈子三十多本书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国内、香港、台湾、美国都出版过作品，还出版过两本英文著作。对一个九旬老人来说，身体是头等大事。

半年多不见，高妈妈好像“返老还童”了。虽然还离不开氧气，早晚要做两次肺部吸氧，但老人家看上去精神很好，思维清晰，说话大声，写字灵活，记忆力仍然让我这“年轻人”望尘莫及。不知道怎么的，她背诵起了女杰秋瑾的诗《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
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
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
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高妈妈说：“俺上初中的时候学过，背过，记得可清楚。”长长的数十句，一字不差。高妈妈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第一次遇到艾滋病病人，哪年哪月哪日记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到哪个村子探望过几个病人，家里死了几口人，留下几个孤儿，一提起来都是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一些数据，一点也不会错。她从来不说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话，对一个九十一岁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高妈妈，我给你带花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迫不及待的要向高妈妈炫耀我的绿手指。经过近八个小时的旅行，这些千娇百媚的“美人儿”还是十分美艳。看护拿过来一个盛满水的花瓶，我准备插进去。

“哎呀！花这个钱干啥？这么好的花，得好几十块钱！”

高妈妈皱起眉头数落我，心疼我破费。无论谁来看她送花来，她都觉得太浪费、太费钱……上一辈的人，总觉得鲜花不是生活必需品，又那么昂贵，放几天就扔了就是浪费。

“俺自己种的，种了十几年了，不是买的。”我用河南话对高妈妈解释。

“哟！自己种的？这么好看，很少见到这么好看的花。给我剪子，我给它修建一下，让它多开几天。”本来我要做的，但想高妈妈想做、能做就让她自己做。高妈妈坐在床边，一枝一枝地修剪着花，又一枝一枝插进花瓶。芍药也红也粉，美丽夺人，它的美是那么短暂。手持鲜花的老人一脸皱纹，一脸岁月，生命到了几乎尾声的时刻。老人和鲜花，这样的画面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宁静，这样的别有意境。



亲自修建亲自插花

我坐在高妈妈对面，用手机拍下修剪芍药的老人，一连拍了好多张。将照片寄去给时常关心她的陈总编，发给远在郑州牵挂她的同乡，发给移民在澳大利亚她的侄女……我想让大家看到高妈妈的精神状况，高兴和放心。第一时间有了回复，陈主编说：“高医生身体这么好。大家都高兴。”郑州的老乡说：“我们都很想念她，看到她有鲜花陪伴，我们很安慰，祝福她！”她的侄女说：“老太太不像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她看有人来有人说话就特别有精神。终于看到她了。”

数百里之外带来的芍药经过高妈妈的修剪，摆放在窗台上，面对着她的床。高妈妈躺在床上微笑着、安静的看着，花的芳香溢满了整个屋子。我坐在她对面和她闲聊，每次来我都不去周围游逛，尽量多陪伴老人。玩可以留在以后，老人的光阴有限。高妈妈又感叹：“多好看的花呀！可大！色可好！”

这时我才发现，以前高妈妈养在客厅和卧室的几十盆花“集体失踪”了，包括我的那盆“绝代佳人”君子兰，还有扦插既长的吊兰，怎么都不见了？“花呢？”看护说：“奶奶都送人了，说她活不了太久了，朋友来看她，她就一盆一盆送人了。”真让人哭笑不得，那些花是高妈妈多年的辛苦培育和浇灌，有些是来人送的，有些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救活的，有些人她自己繁殖的，怎么舍得全部送人呢？我对着高妈妈的耳朵“兴师问罪”：“俺的君子兰呢？”高妈妈说：“叫俺送人了，俺还能活几天？你那君子兰开花了，还有了儿子和孙子（分出了新枝）。都叫我送人了，让他们到别人家去吧……他们可喜欢，都爱花。”

“没有关系，只要你高兴。”

虽然我不知道君子兰送养到谁家，多少有点不舍得，因为我是看着它从一两枝叶子的小苗苗成长成叶子繁茂的一盆花，带来纽约的那天又是包裹又是捆绳，一路小心翼翼。但是我完全明白，那是高妈妈送给这些年来关心她、探望她、帮助她的大朋友(七、八十岁)、小朋友(四、五岁)、中国朋友、外国朋友、知名朋友、普通朋友的心意。已经九十一岁的她知道，有一天她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些花会继续活着、鲜绿着、生长着，在一个教授的案前，在一位学者的书架上，在一位小学生的玩具边，一如她悲天悯人的爱，永不枯萎，永不凋谢，永不消失。这些并不名贵、并不值钱的花无声地传达着高妈妈对每一个人的爱！

“我还给你的小胖准备了礼物。”高妈妈一直很关心我的儿子，他身体有点胖，就称呼他小胖，知道小胖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高妈妈准备了礼物。她指著书架上的一条毛毯说：“你让小胖好好学习，到三十再结婚。那个毯子给小胖，人家送给我的，那天非要给我铺在床上，我这么大年纪，铺上干啥？我收拾起来，给小胖当个礼物。”新毯子老人家自己不舍得用，却留给我的儿子。我知道是她的一片心意，我没有拒绝，没有客气，赶紧接受了。因为我太了解高妈妈的脾气，恭敬不如从命，我接受了她才会特别高兴。高妈妈在美国仅仅有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但她总想给别人一点什么。好像我没有空手而回的时候，上次她的女儿从郑州带来会烩面，她也非让我带几包尝尝。

高妈妈一向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一块花。和她坐在一起，我看见她穿着领子打着布丁的衬衣。这个年头，人们都一天三换，谁还缝缝补补？就是纸巾，她也舍不得用一次扔一张，整整齐齐折起来放在床头，用一次折起来下次再用，反反覆覆用了才扔掉。高妈妈多年都不买牛羊肉，是因为牛羊肉的价格比较贵，她

吃得最多的是比较便宜的鸡、鸡蛋和豆腐……。她成千上万美元的稿费、奖金都购买了关于艾滋病的书籍，赠送给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研究人员、各种会议。花费这样的钱，她从不心疼。她希望人们知道艾滋病的真相，关注这场世纪之灾。

每次见到高妈妈，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老人回信。很多重要的不重要的，着急的不着急的信都需要回复。总是高妈妈一边口述，我一边帮助她打字。最近高妈妈的一位老朋友患了XX癌，让高妈妈心痛担忧的吃不下饭，她让我马上写信：“你得了这个病，让我非常自责，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好好问过你。你这个病，从确诊以后，最好在一两个星期做手术，生存率比较高。我研究女性绒细胞癌多年，参加过全国和国际研讨会，获过奖。癌症一旦确定，越早动手术越好，你是有才干的学者，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和工作的。不像我，已经九十一了，无所谓了。你在哪个医院？动手术以后，我让护工推着我去看望你。我没有早早给你建议，我很自责。”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问高妈妈：“你怎么去看望他呢？”一个上厕所、洗澡都需要有人帮助的老人，一个已经离不开呼吸氧气的老人，怎么去探望另外一位病人？“到时候我雇个车，带上氧气器，叫护工送我去。就是花点钱，无所谓。”我想这位高妈妈的老朋友一定知道这位老医生的倔强和固执。年轻时候的她，听说一位产妇难产面临危险，她连夜骑上毛驴到农村抢救下了这位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如今已经不能走路的她要以老病之身乘车去看望患病的老朋友。她说过：“我是医生，看到病人，我的腿就迈不开了，就想治好他。”高妈妈脱去白大褂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但是她永远都没有从医生的角色中退休。

高妈妈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名誉的人，从不接受任何捐助，也不允许任何人以她的名义成立组织或者基金会。她有点生气的告诉我，现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如何假装成一个国家的罪人》写到：“在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贫民窟，住着一个91岁的中国老奶奶……她的家人都在国内，他们视她为流亡海外的叛徒，拒绝和她相认……邻居的眼里，她只是一个举止奇怪的亚裔老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消失，并在腐臭后被救护车拉走。”高妈妈的儿子和女儿都先后来到美国探望老母亲，怎么就说成拒绝相认呢？高妈妈出门遇到白人黑人邻居都会热情的打招呼，怎么说成举止奇怪呢？

高妈妈说：“你看他写的，我怎么住在贫民窟呢？我这里一个月两千美金

的房租，还有三个二十四小时的看护。你多照点相，发给他们看看，这里是不是贫民窟？有人成天胡编乱造。”我看到这篇文章也觉得不妥，这位署名“摇滚客”的作者是自己凭空想像，并不了解情况。高妈妈来到美国以后，享受全部的免费医保，在她身体不便以后，从以前的白天看护增加为二十四小时看护，有三个女看护轮流着人给她买菜、做饭、洗澡、洗衣、做家务。这样的待遇，如果在中国高妈妈这样的地位恐怕都得自掏腰包吧？慕名而来看望高妈妈的人很多，小小的屋子总是充满了笑声和话语。就这套小公寓，2014年还曾经是“刘宾雁良知奖”的颁奖厅，数十位学者和教授参加了颁奖典礼。怎么能说出“死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么难听的话？用高妈妈的话来说就是：“瞎话，编瞎话。”

生命不息，爱永不止。高妈妈告诉我：“我最近在请人募捐，给那些艾滋孤儿捐衣服，还有鞋子。夏天过去，冬天就来了，那些孩子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我给他们想想办法。”这位老人每天要吃数种大小的药片，测量数次血压，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但是，她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些因为卖血而死去，留下的无辜可怜的孩子。她的爱就像天上那颗38980高耀洁行星，不停的闪亮着，永远挂在天空。

高妈妈希望我多住几天，我也希望能够，可是我得回去工作，照顾自己的家。她躺在床上，不能像以往那样推着扶椅送我到门口，目送着我离开。我俯下身脸贴住她的脸告别，我不曾有过这么亲密的举动。因为我害怕，因为我心揪，害怕再也没有机会贴住她的脸，心揪这是最后一次.....

穿上鞋子，我仍不想离开，又返回她的卧室，又一次脸贴住她的脸，告诉她：“高妈妈，我走了。”我又大声对着她的耳朵说：“高妈妈，你好好的，我到秋天再来，给你送向日葵花。”脸又一次贴住她的脸对她说：“高妈妈，你好好的，明年芍药开花了，我还要来送。”

世界上有一种感情会超越亲情。我爱我的高耀洁妈妈，那是因为她这一辈子，撒向人间的都是爱！

——《纵览中国》首发—— Tuesday, June 19, 2018

君子之交淡如花

——我和高耀洁老妈妈的花缘



花美人美此景美。

前两天，我刚刚从纽约看望九十三岁的高耀洁老妈妈回来。去的时候带去了一大束绣球花，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盆植物盆景，真可谓花来花往，一路芬芳。

让我比较遗憾的是五月杜鹃、六月芍药盛开得千娇百媚时，我却因为家事走不开，不能给高妈妈送去花，令我自责好久。当然，鲜花店里的玫瑰康乃馨一年四季花点钱就能够买到，但那种感觉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我喜欢送给高妈妈我自己亲手种植的花，每天每日精心呵护的花，盼望着冒出苞蕾，吐出花瓣的花。这些花经过我手上的温度，会对她传达我的尊敬、爱意和心情。就像我从不从餐馆给高妈妈买放油过多和使用MSG的外卖，每次去我都会和面剁馅包饺子，或者做一锅简单的汤面片，全部手工……。生活中，对爱戴的人，我喜欢花费一些时间，慢慢的做饭，享受这个过程，享受那个滋味。

我必须马上去看望高耀洁老妈妈。这些年以来，每隔两、三个月我都从波士顿去纽约看望她，不去，就心发慌，神不安。这到了七月，烈日炎炎，败了芍药，开了绣球，也粉也蓝也白，如青春年华的女子，每一枝每一朵都毫不谦虚的展示自己的娇丽。我盘算着带给居住在八楼，因为身体不方便极少下楼，看不到绿树花园的高妈妈。我知道，这些年来，除了写作，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花儿。去年我带去芍药，她都是自己操剪修整插瓶，“指挥”看护摆放在床前床头，她随时能够看到的地方，让花陪伴着睡觉、吸氧、吃饭、回忆往昔……

从波士顿坐汽车到纽约需要五个小时左右，再加上前后的两个小时地铁，要在七个小时、九十度高温下携带鲜花不能不说是相当困难。我早晨起来，手持剪刀，在花园里“嚓！嚓！嚓！”地挑选最好看的、最大朵的、最新开的绣球花剪下二十几朵。并非我“心狠手辣，残酷无情”，我只是想让一位天天躺在病榻上、回不了自己的国家、时常见不到儿女亲人的老人高兴，在她手捧鲜花的那一刻，脸上会露出花朵般可掬的笑容。

我从一位有经验的插花师那里学到一招，用厨用纸巾浸透水，包住花的枝干，然后用塑料袋裹紧。又用包装纸将花朵保护住，免得让它晒着、吹着、碰着。上巴士的时候，检票员有点为难的说：“这件有点大，不好放吧？”大件行

李一般要求放进巴士舱底。我强调：“是鲜花！”检票员马上网开一面同意我带上车，其实，放在舱底未必不安全，只是我自己不放心，我要看着它，呵护它。一路上，绣球花就在我的身边，然后在纽约高温的地铁下穿行、倒车、登上公寓电梯……

“高妈妈，俺给你带花来了！”

我欣喜地站在高耀洁老妈妈卧室门口，心情忐忑的打开跟随我奔波了七个小时的花，担心它的状况。撕开包装纸，上帝呀！每一朵花儿都是鲜活的、水灵灵的、美丽动人，丝毫没有焉的迹象。我在心里默默叫道：“真是奇迹！当你诚心诚意的对待一个人、一种物、一件事情，奇迹就会出现！”

“真好看！真好看！你拿来这么多，把你家花园都破坏了。”

看到眼前一下子“盛开”出这么多鲜花，高妈妈一个劲儿夸赞，脸上也露出如花的笑靥，嘴张得好大。在纽约寂寞孤独的日子，花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慰藉和快乐。

看护找来三个大花瓶，盛满水。我们两个听高妈妈“发号施令”，按照她的意见插花，搭配颜色，错落有致。一瓶摆放在堆满各种药品、医疗仪器的床头，两瓶摆放在“门可落雀”的窗台上。我这么形容，是因为以前这里一尺多宽的窗台，繁荣昌盛挤如花圃，有君子兰、兰花、绿萝、兰草等等，这些盆景的背后是哈德逊河上的大桥和曼哈顿的夜景。如今，窗台上只剩下今年三月十一日前美国国务卿喜拉莉女士看望她时送来的盆景，还有一位报社记者送来的花儿。

“赶紧照相，好花不常开，照相！”

高妈妈的看护提议。高妈妈坐在床上，鲜花环绕着她，她开心地笑着，花们也开心地笑着，我连续按下几个镜头。看护又导演她手捧鲜花多照几张，我半蹲着，镜头里的老人笑得像个懵懂未知的孩子，满嘴没有一颗牙



高妈妈手捧鲜花开心地笑



亲亲老妈妈

齿。这些花儿的到来，让没有一件像样家具，基本上都是看护从街边捡来的二手货的家充满了生机和美丽。这些花儿恣意烂漫地捧在为在中国艾滋病血祸抗争二十多年的耄耋老人手里，它们是这么的美，她是这么的美，她们在一起是这么的美。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眼前又浮现出那幅最美好的画面。

“不知道能新鲜几天？”纽约持续高温，我担心花的前途。

“就是新鲜一天也值得，你看奶奶多高兴！我们三个多开心！哈哈！”

看护这么说，言之有理。这么远带花儿来就是想让她高兴、让她愉悦、让她笑。高耀洁老妈妈是妇科专家，知名教授，在养花务草方面也能马马虎虎评定上半个专家。一五年夏天我第一次来拜访她，一眼就看见客厅、卧室的窗户上摆放满了盆盆罐罐，染绿了窗户。从聊天中得知，这些花大多数是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粉丝们送来的，少部分是看护在路边捡回来被别人弃养的残花败枝。那时候高妈妈的身体还比较好，可以推着轮椅在屋子里自由走动，她给花换盆、添土、施肥、浇水。她说她爱养花，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高妈妈妙手回春，经过她一番精心的照顾，初来时那些萎靡不振、奄奄一息的花儿不久就发出新芽，蓬蓬勃勃，青翠欲滴的回报她的“救命之恩”。她说她爱孩子，她看不得那些艾滋孤儿受苦，她用自己的退休金、稿费、演讲费一百多万元供继这些孩子读书，改变了一个个孩子的命运。如今这些长大的孩子，能够自食其力的孩子会通过各种

方式传递他们的思念、感激。救活一株花、帮助一个人，都是功德无量的的美事。虽然花儿不会言语，孩子们也见不到他们的高奶奶，但是人所做，上苍都记得……

我和高耀洁妈妈以文会友，更是以花会友。这些年来，每当高妈妈出版了新书，总是多送几本给我，一本我自己留下，其它送给曾经帮助过她的编辑朋友。我们经常交换彼此的最新文章，见面的时候一起讨论修改。高妈妈思维敏捷活跃，但是打字速度慢些，我就是她的手，她一边说，我一边打，她说这里错了，我就删去。因为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我也会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比如更加详细，比如列出实证，如果我说得有道理，高妈妈总是马上接受，不会拿一点架子，这让我非常开心。每次见面，只要她身体允许，我们都会坐在电脑前一起工作好几个小时。有时候我害怕她劳累，我说：“不弄了，你休息。”她却说：“不急，把这些弄完。弄好了我就安心了。”每次来，我都想给高妈妈带花，带过君子兰、荷花令箭、兰草等等。每次走，高妈妈也非要让我带走一盆花，虽然花盆沉重，又要下地铁登巴士，但老人家的脾气是说一不二，再说，我带走了她的花儿她才高兴。我带回来过菊花、绿萝、玉树等等，渐渐的，她家有我家的花，我家有她家的花。君子兰开花的时候，高妈妈寄来照片，她说：“你的君子兰在俺家生孩子了，孩子也长大了，还开了花，开得可好看。”我一看，这“孩子”和在我家的“妈妈”长得一样叶绿花娇，真给我脸上争光。

但是前几次来看望高妈妈，她多年养育十多盆的花儿统统不翼而飞，床前一片空白。没有了花儿，房间里缺少了绿色缺少了生机，远处的曼哈顿高楼大厦灰溜溜的，也没有那么迷人了。

“花呢？”我惊讶的问。

“花都叫我送人了，我这次昏迷，紧急抢救了三天，我可是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了。我就想，我死了，花就被扔了，不如我活着的时候送人，让它们好好活着。你送我那盆君子兰，我送给XXX了，她经常来看我，总是带点蔬菜和豆腐，现在菜也很贵呀。那盆最大的绿萝，我让人捎带到华盛顿送给XXX主编，人家找钱给我出版书，我没有啥能感谢的，就送他盆花吧，绿萝放在家净化空气。我多移植了两盆荷花令箭，XXX的小孩来，我送给他了，他可喜欢植物……”

面对空窗，我的心也有点空，有点酸，特别是我曾经辛辛苦苦从波士顿带到纽约送给高耀洁妈妈的君子兰，如今被“送人”了，自然很不舍得。但是又

想，我的花送给她就是她的花了，这是高妈妈喜欢做的，她喜欢给人送书，从不收取一分钱，每一本新书都送出数千本，花费好几千美元，她从不心疼。她喜欢给人送花，希望自己培养、浇灌、养大的花让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带回去，有一个新的家，留下一份念想。留下老人家的慈爱、温暖、和祝福。在高妈妈眼里，花何止是不怎么值钱的植物，花既情，花既爱。赠人玫瑰，留香在手。这样想想，我也就释然了。她的花、我的花或者着去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或者去了新泽西的森林小屋，或者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拥挤的学生宿舍，或者去了遥远外州一个学者的书房……我知道，高妈妈对底层人、对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对那些最贫苦的农民什么都舍得，但对自己，什么都不舍得。听看护说，因为生活费的降低，两个月以来，高妈妈天天吃最便宜的鸡肝，一盒一块多可以吃两顿。让我听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买书的钱稍微少一点，她的生活就不会这么清苦……

这次来，高耀洁妈妈精神颇好，我们又可以坐在电脑前修改她的书稿。她说我改，一工作就是三、四个小时，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有时候，我会替她回信，高妈妈的朋友特别多，只要她看到来信就马上回复，同时转



前国务卿喜拉莉女士来看望高妈妈

去有关艾滋病的最新书籍信息和资料。她小小的家，好像一个不挂牌的交流中心，知名学者、艾滋病专家、NGO负责人、记者、学生等等总是络绎不绝的来到这里，谈天说地。我突然觉得，她的家更像是一个小小的课堂，不但传播着医学知识，更是言传身教着为医之德、为人之德！是的，我从不觉得我大老远跑来是件劳累的事情，我从她身上获益匪浅，她给予我很多很多其他师长不能够给予我的东西。能进到这个教室，能有这样一位老师，是我的幸运和福气。况且还包吃包住。

更多的时候，高耀洁老妈妈躺在床上，二十四小时带着氧气。她翘起浮肿

的小脚，大小便也需要在床边解决，然后由看护清洁。她不停的吐痰，因为肺部有问题。她每天要吃这样那样的药物，以维持正常的血压和对付身体其他毛病，当了一辈子医生救死扶伤的她，如今是个专业病人。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常常她听不见我说什么，需要用纸笔写下来，她看看然后回答。我喜欢就这么陪伴着她，看着她。可惜我住得比较远，不然可以一个月来一次……



前国务卿喜拉莉女士送来的鲜花

“你来，让我很安慰。”高妈妈这么对我说，以前她从来没有对我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她又说：“咱俩熟了，啥话都说，就像家里人一样。”她这么说，一时让我

感动莫名，我上前搂住老妈妈，脸贴着她的脸。哎-----！我是中国人，说不出美国人的那种“我爱你”，也叫不出口“妈妈”。但是在我心目中，她比我的母亲还重要、还亲近。我和母亲是血肉亲情。和她是精神的朋友、感情上的朋友、写作上的朋友，当然，还是爱花如命的花友。我想，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在她的暮年走进她的生活，在她需要的时候陪伴着她，协助她整理宝贵的书稿。我想，我爱这个老妈妈，我就用文字说出来吧。写出来，她会看到的。老妈妈，我爱我的高耀洁老妈妈。

“你在我这多住些日子，我舍不得叫你走。”“我把你的行李藏起来，不叫你走。”很多次，高耀洁老妈妈都这么说，就像需要人陪伴玩耍的儿童。我不敢看她期望的眼神，我知道她的孤独，她一个人要面对数不清寂寞无伴的时光。我何不想在她这里住一个月，给她买菜、做饭、聊天、修改文章、多陪伴她。但是我还有一份工作，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休假还要去做更重要的田野调查。每次来都是三天，我从不出去玩，虽然中央公园就在附近，我也没有去过，不是高妈

妈不让我出去，是我自己舍不得出去，尽量多和她在一起，那些游人如织的景点什么时候不能去呢？我内心充满了愧疚，又没有办法。

短短的三天瞬间就过去了，因为高妈妈不能使用空调，房间里比较闷热，绣球花萎缩了几朵，但大部分依然鲜艳。我又给高妈妈做了汤面片，用西红柿鸡蛋炆锅，撒上绿茵茵的香菜。“我取掉氧气，我出去咱俩一起吃。”一起吃顿便饭都是“奢侈”，从前年住过院，高妈妈需要二十四小时吸氧，睡觉也戴着。她去掉氧气，推着轮椅，一步一步走出卧室，费劲的坐在饭桌前。“真好吃！”她说，对饭菜她从不讲究。我说：“你爱吃，我就高兴。”我们面对面坐着，吃着面，我吃得快，已经吃第二碗了，她一碗饭还有半碗。“你会做饭，俺不会做。”我笑了，我知道这个能够给妇女摘除肿瘤、治疗绒线细胞癌、在妇女难产时抢救母子生命、骑着毛驴到乡下给难产孕妇接生的大夫不会做饭、不会织毛衣、不会像普通母亲那么照顾她自己的儿女，她压根不是柴米油盐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小女人。她是心里装着天下慈悲为怀的灵魂高洁的人。她是这个世纪中国尚在人世不多的小脚，如一位朋友形容，她是一位“小脚天使”。

一碗面高妈妈吃了半个小时，吃得很费劲。她说：“我感觉我不行了，脊背可疼。如果我死了，你还怎么来呢？看谁呢？”我拍拍她，对着她的耳朵喊：“按你的年龄你很好，你要活到一百岁！”我相信善人有后福，高妈妈会健康长寿。

“我说，你每次来，都要花钱，我也给你出不了路费，也没有啥送你的。”高耀洁老妈妈这一点完全像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来个人，总不让人空手走，总能翻箱倒柜着找点什么让人带走。高妈妈给我送过茶叶、红枣、河南烩面等，这些东西都是来人送给她吃的，她总分一点给我。虽然不好意思拿老人家的东西，但恭敬不如从命，我拿了，她才安心，觉得给予了我什么，是她微薄的心意。“我想了半天，你把喜拉莉送给我的花带走吧，一般人我还舍不得给。”我受宠若惊，怎么能接受这么珍贵的礼物呢？“你留下吧！”高妈妈手一摆很坚决地说：“不！你带走，这花不是啥名贵花，但是送花的人不一般，有意义。你爱花，你把它照顾好。”

我顺从地点点头，老妈妈的心意我必须接受。

“你拿走，我就放心了。花长好了，你给我照个像寄来就行了。”

五年了，我已经非常了解高耀洁老妈妈的性格，干脆利索，而且性格比较急。我小心翼翼的给花淋撒了一些水，装进环保袋，以准备长途跋涉。我还会要

求把花提上巴士，免得在车仓里受热受挤受欺负……。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在乎这盆花来自于位曾经的美利坚国务卿，我只在乎它来自于我的老妈妈，她送花是对我的一种关爱、一种鼓励、一种寄托，希望我像她一样，多为中国的底层人发出声音，多干点踏踏实实的事情，多写几本书。

“高妈妈，我走了，过段时间再来看望你！”

“你走吧，我不送你，我太累了，没有办法。你走，早点到家。”她躺在床上，扬起脸看我。我又一次俯下身搂住她的脖子，用脸贴贴她的脸，让她感觉到我的皮肤、我的不舍、我的爱……“你好好的，我再来看你！”

如今，高耀洁老妈妈送我的盆景花就摆放在我的案头，我不时的抬头看看，浇浇水。有时转一下方向，让它均匀的晒到阳光。有时候，我看见高妈妈在花前咪咪笑着，对我说着话，一口河南口音。它陪伴着我，我陪伴着它……

世界上，有一种感情超越生死相许的爱情、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就像我和我的高耀洁老妈妈一样，不是母女，胜似母女。感谢这些凡花俗草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简单、温馨、美丽！寄托着我们对人、对世间无尽的爱！

——《纵览中国》首发—— Monday, November 30, 2015



喜拉莉说：保护你就是保护历史。(后立者为黎安友教授)

2020 祝在纽约的高耀洁妈妈 母亲节快乐!



每年到纽约三、四趟看望高妈妈

昨夜睡不着，想着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着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一座高楼中的高耀洁妈妈。想着今年的母亲节因为疫情把纽约折腾的“战火纷飞，死亡惨重”，谁也不敢出门，谁也不敢让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这个母亲节，九十三岁的老妈妈将孤独度过，没有人来庆贺，没有人送来鲜花，没有人拥抱病榻上的她。当然，我也知道，朋友众多的她，问候和祝贺信会“雪花般”的在邮件中飞来。

疫情期间，我最惦念的就是高耀洁老妈妈，虽然她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避免接触任何人。但是她有三个看护，轮流上班，是比较危险的因素。因为她们每天会乘坐地铁或者公共汽车，也会接触其他看护对象。如果她们把病毒带去，后果不敢设想。我在心里总是念叨：“高妈妈，我们一定要熬过这一劫，一定。”



去年母亲节送给高妈妈的玫瑰花

我和高妈妈的看护之一有微信联系，我常常问候高妈妈情况怎么样？一切可好？我们还视频了两次。看到镜头里的高妈妈精神不错，说话大声，而且思维清楚，我就放心了很多。比较可惜的是，她近年耳朵失聪，我说什么她也听不见，我们无法交谈。但是能够这样“见见面”，已经让我很开心，很满足。

我最后一次去纽约看望高耀洁老妈妈是去年的十月份，说来已经是大半年没有去纽约了。年初天气寒冷，说等到三月天气暖和点就去。不想等来的是纽约封城，等来的是纽约演变成了美国武汉病毒感染的第一名，等来的是天天纽约死亡上千人的消息。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繁华之都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疫区。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巴士早已经停运，况且我不敢冒死去纽约，就是我不敢，也不敢把病毒带给年老体弱的她，万一汽车上地铁上感染呢？病毒可不长眼睛，可不认

人。没有办法，病毒阻隔了我们每三月一次的见面。

“我想你了，我给你准备了两个大花盆，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来拿？”高耀洁老妈妈对我这么说。说起来老人总是这么有心，她没有什么能力给予我什么，但总想点办法，她让看护到处找来别人丢弃的、比较好看的花盆，收拾干净，用塑料袋子装好，让我带回来种花。虽然上下地铁很麻烦，但我也带回来几个花盆，放在后院，种上各种花卉。每当我看到的时候，都感觉暖暖的，因为它们来自纽约，来自老妈妈的心意。

“你看，你上次带来的花都长大了。”从微信镜头里，我看到我去年带去的吊兰、螃蟹兰的确长得蓬勃旺盛，招人喜欢。虽然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但给这俭朴的卧室带来绿意，她说过看到花会让她心情好一些。我捧着手机，捧着花，看到镜头里的高耀洁老妈妈向我微笑着，她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假牙又不太合适，戴上不舒服，她也很少戴。虽然笑着，我心里生出莫名的酸楚，老人家来美国已经十一年了，儿子、女儿、孙辈都不在身边，她多么寂寞和孤独。

尤其是疫情以来，我几乎天天给我二十四岁的儿子打电话，问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做了什么，叮嘱他出门戴口罩手套，听到他的声音我就高兴。也去看望了我的儿子三次，给他送食品和日用品。虽然因为疫情我不能拥抱他，抚摸他，不能一起吃饭，但是我至少想看的时候能够看到儿子。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爱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虽然三位看护把高耀洁老妈妈衣食住行生活上照顾的很不错，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想念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么大年纪，特别是人在异乡，特别是身体有恙的时候。想到这些，都让我更加心疼我的老妈妈，眼泪溢满在眼睛里。但是我还是笑着大声说：“等着，过段时间就去看望你！”

2009年，我的高耀洁老妈妈来美国的那一年已经八十二岁，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人了，也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以她主任医师、高级教授、还有绒细胞治疗的专利等等身份，完全可以生活的衣食无忧。全国各地高校、机关单位邀请讲座的劳酬也能让她挣的盆满钵满，腰缠万贯。但是她一双不大的脚选择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不畏权势，只说真话，为受苦的百姓发声。做到了“但愿人常健，何妨我独贫。”

高耀洁老妈妈在纽约的十年是怎么度过的？我最清楚。这五、六年来，一年当中，我会去纽约四次，有时候三次。每次去都是来回三天，住在高妈妈的客

厅。有时候，我七点起来，捏手捏脚去上卫生间，不想路过高妈妈的卧室，她已经坐在电脑前。我进去向她打招呼，她会喜眉笑眼的说：“半夜我睡不着，我想起两句话，赶紧把它加进去，不然就忘了。老了，脑子不好了。”高耀洁老妈妈不会拼音输入，是用写字板一笔一划写上去的，进度非常缓慢。她是到了年近七十才开始学习和使用电脑，已经算是与时俱进了。

来纽约的十多年，高耀洁老妈妈已经出版了《血灾 10000封信》、《镜头下的真相》、《高耀洁 忆往昔》、《悲惨年代》等七本书，去年还出版了一本诗词集，够得上一位专业作家的产量了。她一辈子一共出版了三十本书，这是令她最值得骄傲的。她写作的内容除了她付出多年调查研究的艾滋病以外，还有几部回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各个时期、各个运动，以个体的经历见证了毛泽东时代的光怪陆离和腥风血雨的历史。怪不得哥伦比亚著名汉学家黎安友教授总是说：“你的经历就是历史，尽量多写，非常宝贵。”在孤单一人的时光，写作是她最大的安慰、最重要的寄托、最可依赖的精神支柱。她就像劳作了一辈子的农人，只要能动，就要下田，就要劳作。



要把毛泽东这个祸根挖出来！

大概八点钟，看护会端来早餐，一般都是麦片粥和两个鸡蛋。高耀洁老妈妈吃得很慢，因为肺不好，总是需要吐痰。她的床头摆放了一盒她自己折叠的纸

巾，可以里里外外多用两次，这样比较节约，连看护都说她太节省了。有一次我看到厅里大窗口上面挂的裤子，补了三块不同颜色的布丁，是看护帮她补的，足可以拿去“忆苦思甜”。看护说：“奶奶不肯丢呀，说补补还能穿。”高耀洁老妈妈在生活上是一分钱掰开两半花，夏天连个西瓜也舍不得买来吃。但是买书、送书上是从来也不会算账。每次有新书出版，她都购买数百本，赠送给来看望她的各界朋友，赠送给美国的一些大学图书馆，更花费昂贵的邮费寄去给国内的朋友。她的一点积蓄、一点稿费总被她花的一干二净。

高耀洁老妈妈是兜里搁不住钱的人，不花了就难受。去年我来，她很开心的告诉我：“我这里有两千美金，是给XX出书的钱，为了艾滋病事业，我一定要把她这本书出了。”在高耀洁老妈妈的力荐下、经济资助下，这本书顺利在纽约出版。要知道，现在出版书比上天摘星星还艰难，年轻的一代手不离机，出版社出书没有销路。两千美元对于一个富佬不算啥，但对高耀洁老妈妈来说是从嘴里节省出来的。她完全可以每天吃的好一些，丰富一些。但是她就是这么一个对自己舍不得，对别人总舍得的人。但是如果不了解情况的人，特别是国内的人会以高耀洁老妈妈名气这么大，去年前国务卿喜拉莉女士都专程来看望她，她一定是手头富足，衣华食美。但是据我所知，喜拉莉女士来探望她就带了一盆花，连点蛋糕和水果都没有带。哈哈，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吧。

第一次去看望高耀洁老妈妈，我在心里嘀咕：“如果她不大愿意多说话，我就坐一个小时就走，如果她愿意说话，我就多坐坐。”我担心一个名声显赫的人摆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说。记得到了中午吃饭时间，高妈妈说：“在我这里吃饭，吃中国饭。”那顿吃的是韭菜鸡蛋粉丝包子，还有小鸡蔬菜汤，一顿简单的饭菜，让我唇齿留香到现在。因为从那天起，开始了我们忘年之交的来往。纽约，成了我常去的城市，高耀洁老妈妈，成了我经常见面、谈天说地的亲人。

说出来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和高耀洁老妈妈相处最多最愉快的时光是工作。每次见面，只要高妈妈身体允许，我们总是坐在电脑前审阅、修改书稿。她说，我做。因为我手脚麻利一点，那么书稿修订的速度也会快一点。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也会商量，谁说得有道理就听谁的。有时候我担心老妈妈坐太久太累，就用河南话对她说：“你休息休息。”她总是坚持说再干一会。必定是年龄不饶人，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她不得不躺回床上。我坐在电脑前校对书稿，时不时回头看看熟睡的老人发出轻微的鼾声，看看窗外纽约晴朗的天空，感念老天的

安排，让我走进一位老人黄昏的时光，陪伴她，和她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个王八蛋病毒，我就会去纽约。从波士顿中国城到纽约中国城需要五个小时，我会在中国城的小摊子上购买白萝卜、大白菜、菠菜、小葱、豆腐，装进一个大大的购物袋。然后下地铁，坐到五十九街转一号车，到曼哈顿一百三十七街下车。钻出地铁口，就能够看到高妈妈所居住的红砖大楼。周围是很多西班牙人开的商店，许多黑人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但从不打扰行人。就在那个街口，有一位黑人妇女，总是嘴里含着哨子，指挥来来往往的行人。我多次看到她，观察她，她不觉得她的工作无聊，刮风下雨她都是那么认真。那座建筑下是不大的运动场，经过时总是听到孩子们叽叽喳喳欢闹的声音……每次按下电梯，我的心情总是有几分激动，因为，我和我的高耀洁妈妈又一次相见，又一次拥抱。

2020年的母亲节，虽然郁金香开得灿烂，枫树正吐出新芽，但是我的心情却如此忧伤，为美国那些因新冠病毒而失去亲人、失去至爱的家庭，为那些在医院病床上痛苦挣扎的人们，为那些失去工作倒闭生意的人们，为那些天真烂漫不能回到学校上课的孩子们……

我的高耀洁老妈妈，对不起，我知道您会体谅我不能去纽约看望你，不能够给你带去鲜花和蔬菜，不能够拥抱你，不能够和你一起坐在电脑前干活，不能够给你做碗面片汤，不能抚摸着你的手聊天……这个母亲节，我好难过，因为我不能够去纽约，不能够陪伴你一起度过。

没有鲜花，没有礼物，没有拥抱，今天用了好几个小时写了这些，就好像和你一直说话，就好像你在我的对面，就好像我能看见你。写到这儿，我不得不摘下老花镜擦去眼泪。我院子里的芍药已经打出肥壮的花苞，但是它们开放的时候，可能纽约还不会解封。前几天，我在门前种了两株玫瑰，粉红色的。在它们的周围种了一些大蒜，那么小虫子就不敢来侵犯它们。等夏天玫瑰娇艳绽放的时候，我希望我能“狠心”剪下几枝给您送去……

高耀洁妈妈，我要说句：祝福母亲节快乐！

高耀洁妈妈，我要说句：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久远！

高耀洁妈妈，我要说句：我爱你！

(写不写这句，我也纠结半天，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不出口这句话，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肉麻。但是我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儿子总是说我爱你，我爱你。思索三番，我还是下定决心说出来，让高耀洁妈妈看到。)

天佑美国！

天佑高耀洁老妈妈！

《纵览中国》首发 Sunday, May 10, 2020



天佑高耀洁老妈妈！

附：高耀洁：祭李文亮医师



狂风无情的吹，暴雨倾盆如飞。
你的人生道路，
坎坷，短暂而又劳累！
天苍苍！你为众生喊出疫情，
遭受非礼，谁之罪！
夜茫茫！世间不平折磨了你，
令人心伤悲！
你的义举，向掩盖者施威！
李文亮医师安息吧！
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

附： 不死的爱和公义

——读依娃《我的高耀洁妈妈》、《中国母亲高耀洁》

楚寒



我一辈子不会说假话

最近，在北美一份网刊上读到旅美作家依娃女士的两篇文章，均是为高耀洁老人而写的，题为《我的高耀洁妈妈》、《中国母亲高耀洁》。前几年，我听说依娃女士出版了《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这是她亲自赴陕西、甘肃一带采访经历了1958年至1962年大饥荒两百多名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专著，心中油然而升起对这位六零后女作家的敬意。这次，读到她写与高耀洁老人的交往点滴、写她心目中的高耀洁老人，不禁一读再读，心中充溢着汨汨流淌的热流和敬仰之情。我读过高耀洁本人的传记，也读过不少他人写高耀洁的文章，在我看来，对于这样一位当代中国拥有稀缺悲悯情怀的老人，关于她的文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高耀洁老人的文字中较长的两篇，是以散文笔法而不是以史学笔法、是以友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访谈者的身份写的，不是以受访者的口吻来述说往事，可以说文章颇为生活化和细节化，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高耀洁老人的敬佩和喜爱，读起来流畅而又亲切。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高耀洁，一个丈夫眼中稍有执拗的女人，一个子女眼中长年奔波在外的母亲，但却是一个悲天悯人、勇者无惧的社会活动家和民权斗士，她乃是近二、三十年来物质至上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中国社会中一个有着高贵品格的象征性人物。当我目睹如此的人性的光芒闪烁于世间，我总是感到此生何其幸运，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在的生活全都天地广阔，我也增添了信心能够在暗夜中期待光明。

由大饥荒调查的作者、同样具有悲悯情怀的依娃女士，来为高耀洁老人撰文，在我看来实乃天作之合。历史学者陈寅恪曾用“许我忘年为气类”这样的文字，来表达他与王国维之间的友情，因为他俩是气类相近、拥有共同精神世界的人。如今，依娃女士专门撰文写下了两篇关于高耀洁的长文，定然能感动许许多多的读者，我向来认为具有崇高品格、且从心底流露出真情实意的文字，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请看依娃女士文中的这段话：“感谢上帝的美意！让我和高耀洁妈妈这位年纪相差将四十岁的人相识交往，我们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相同的对农民和底层人的悲悯同情，我们都喜爱写作，而成为精神的朋友。她高尚的人格、坚毅的精神、渊博的学识、待人的真诚和宽厚更是成为了我今生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楷模。”

高耀洁平生的职业是产科和妇科医生，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治病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到了1990年代，退休后的高耀洁因在一次会诊中接触到艾滋病患者，从此开始了她的防治艾滋病事业。正是在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大陆

众多省份因卖血和血浆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惨剧才被揭发出来。十几年来，高耀洁不仅以老弱之身投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救助行动当中，而且在各种场合呼吁全社会正视因血液传播导致艾滋病蔓延的严峻事实。老人因此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中国的德蕾莎修女”。

前几年，当我在阅读有关高耀洁的推介文字时，不禁想到了另一个光辉的名字，即经济学家马寅初。1957年，75岁的马寅初通过广泛调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大声疾呼：“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节制生育，后果不堪设想”。不幸的是，马寅初的倡议与毛泽东策划发动的以“人多好办事”为基调的“大跃进”相抵触，遂被定性成了“反动思想”，批斗、免职、软禁的厄运接踵而来。马寅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出的警告，完全被后来中国大陆的现实证实了，“误批一人，错生四亿”让整个民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人口过多的问题至今依然是中国大陆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

时隔五、六十年，当我们怀想1957年那个智慧而勇敢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又一个老人在今天向中华民族发出的一声呼喊：“在中国，如果还不对艾滋病进行控制，以及有效的救治疏导，将是一场国难。”发出这声呼喊的正是当年已80岁高龄的高耀洁，她的名字从此和中国大陆的艾滋病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正如马寅初与中国大陆的人口问题。高耀洁与马寅初一样，他们都忧国忧民，言人之所不敢言，以一副老弱身躯面对各种打压仍不改其志，在被围攻中傲然挺立、坚持真理。他们都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向整个民族大声疾呼，并因此开罪当局但不改初衷。

高耀洁在防治艾滋病的道路上走了艰难坎坷的十几、二十几年，她所揭露出来并警醒世人的大陆艾滋病的现状令人触目惊心，她揭露血祸真相、对抗艾滋骗局、照顾艾滋患者及其孤儿，不遗余力地向农民和其他民众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医学知识。她忧心忡忡地强调，中国艾滋病病毒主要是通过“血传播”方式传播，正以每年三成至四成的速度往上升，全社会亟需公开正视、采取对策。然而，高耀洁不断遭到河南当局及其他有关当局的整肃，她的行踪被盯上，她的电话被窃听，后来又有警员监视她，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她所撰写的关于河南等地“艾滋村”的书籍被禁止。甚至于，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母亲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移居国外，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在屡遭打压的情况下，高耀洁被迫于老迈之年出走异国他乡，独自一人居于纽约曼哈顿。

也许在当局眼中，高耀洁与当年的北大校长、经济学者马寅初一样，都是好唱反调的乌鸦，是让人讨嫌的。但我想，中国大陆的当代历史自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因着他们始终站立着的良知和勇气，始终坚持独立知识人的时代责任感。高耀洁多次说过：“我是医生，一看见病人，我的脚就挪不动，就想着治病救人，解除病人的痛苦。”我想，大陆当局不该如此对待一位忧国忧民的老医生，更应该向她表达一份尊敬，并且听取她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忽视高耀洁这些年来奔走呐喊的大陆艾滋病问题，也许会像当年不听取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发出的警告一样铸下大错。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时政撰文者，有时我会为中国大陆的社情政情心生沮丧，但是每当我读到像倪娃女士这样的文章，我就看到一种在这个时代早已失落的精神，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散放光芒，这使我没有理由为中国大陆及人类的未来而悲观。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致力于不让时代向下沉沦的“高耀洁们”，这些年来年已八旬、九旬的高耀洁依旧在为生灵的苦难奔走呼号、老骥伏枥、撰著呼吁，我想，有高耀洁老人这样的耿亮之士在奋斗呐喊，在承受苦难，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蹉跎岁月或者意志消沉，因为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不死的爱和公义、不死的精神所照亮。

写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威斯康星



高妈妈想念艾滋遗孤们



给我的高耀洁妈妈献上一束鲜花、一片心香!

感谢挚友谭松先生作序，并编辑排版这本小册。